

不能忘却的人间灾难

唐山大地震

作者：钱钢

目录

21 世纪新版序

凝神于北纬 40 度线的思考——1986 年版代序 徐
怀中

我和我的唐山——引言

第一章 蒙难日“7 28”

3 时 42 分 53.8 秒

大自然警告过

目击者言

濒死的拂晓

第二章 唐山——广岛

红色救护车

陡河！陡河！

开滦！开滦！

目标——唐山

剧痛中的城

天上地下

抢夺生命

第三章 渴生者

三天：一对新婚夫妻和一把菜刀

八天：“小女孩”王子兰

十三天：大大超越生命极限的人

十五天：最后的五个男子汉

第四章 在另一世界

宾馆

看守所

精神病院

盲人居住区

40 次列车

第五章 非常的八月

罪恶能的释放

推开瘟疫

“方舟”轶事

政治的一九七六

第六章 孤儿们

3000：不幸的幸存者

我和我的小拖拉机手

张家五姐弟

第七章 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

“饿死他们！”“疼死他们！” “枪毙他们！”

“七·二八”在国家地震局

备忘录（一）

备忘录（二）

历史记着他们

我的结束语

附录：

纪念我的蒋叔叔

1996 年修订版序

1996，我的唐山——1996 年修订版后记

《20 世纪中国重灾百录》序

从唐山大地震到 “非典” 疫潮——2003 年 9 月 21

日日在香港中央图书馆的演讲

20 世纪著名大地震简介

20 世纪中国的十个大地震

20 世纪国外的十个大地震

21 世纪新版序

本书所记录的历史事实，时而被人淡忘，时而又被突然提起。被淡忘的日子，它本应被记忆；而被突然提起，却每每在不忍回首之时。

我们就是这样走出 20 世纪，走入 21 世纪。20 世纪是人类欲望和人类力量急剧膨胀的世纪；然而在世纪之交，忽然巨灾迭至。面对 21 世纪，恐惧和无望在蔓延。

仅仅数百年，人类像幼草突然拔地参天。我们曾经放大了自己的历史——地球生命史的最后数秒钟，而傲慢地忽略了地球数十亿岁的存在。可是刹那间，我们又把自己当作狂风里的一粒微尘，悲叹人的脆弱，命运无常。

尽管人类有了把自己灭绝数次的可怕力量，但人类永远不可能扭转乾坤。地球还是那个地球，它在呼吸，在行走。时而一声叹息，火山爆发，海啸降临。地球向人类裸露出许许多多的秘密，但秘而不宣，甚或成为死谜的则更多。

反躬自问，人类本身何尝不是如此？人类看似已经

成为自己的主人，掌握（许多时候是操纵、摆布、践踏）自身的命运，但人类同样远远未能看清“我是谁”，同样无法真正左右自己。不明原因的疫症，有时骤然爆发；人类的精神，更不止一次发生强烈“地震”。

我们不是地球的主宰，也不是地球的奴婢。我们是天地所出，是地球的一部分，宇宙的一部分；包括我们的血肉，也包括我们的灵魂。一个完整生命，有着不可侵扰的脉动，有着无可阻遏的气血流通。但侵扰和阻遏却每日都在发生。这也是生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地球和人类都在沧海桑田的变动中演进。

走过历经巨变也历经劫难的数百年，21世纪，人类的心灵将发生深刻的演变。高歌“让世界充满爱”或者“我们共有一个家”，并不困难。只有直面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生存冲突和数百年冲突留下的深长断裂，“爱”，才可能真实而有分量。

我们必须面对，面对人世间、地球上和宇宙中的一切：你愿意看到的和不愿看到的；你能够承受的和无法承受的。这实际上是“四目对视”：我们在面对自己。

我没有看清前面的一切。对无数的悖论，我没有答案。但我相信，答案埋藏在 20 世纪最惨烈灾害的废墟里面，埋藏在我曾经目睹曾经记录的历史里面。

2005 年 1 月 9 日 · 香港大学

凝神于北纬 40 度线的思考

——1986 年版代序

徐怀中

至今，只要一提到唐山，我立即就会想起十年前那个凄冷的“7□28”清晨，来自唐山的地震波所引起的躁动和骚乱；而那个属于唐山也属于人类的“7□28”劫难日——它是怎样到来的，又是怎样逝去的？它究竟给我们这个星球留下了些什么？却始终是个“谜”。

作者钱钢要解开这个“谜”的创作冲动，我不知缘自何时，只记得他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期间，把第一学年的寒假、暑假，以及国庆节、新年和春节等几个假日，几乎全用在了对《唐山大地震》的采访和写作上。当时我对他说，春节还是要和家人一起过的。他说：“不，我要去唐山过节。”

在唐山地震十周年前夕，我看了他刚刚完成的手稿。迫不及待地一页页翻过去，我看到了那座在顷刻之间被

毁灭了的城市，看到了那无数从废墟上挣扎起来而忘记自己衣不遮体的男女，也看到了掩埋在新的城市下面的二十万长眠者。在这里，大自然的景观和人的心灵世界的景观迭加映照，宏观的泼墨和微观的工笔交融一体，畸形年代的畸形思维和严肃科学的严肃命题对立而统一，逼真地画出了一幅属于唐山也属于人类的“7□28”劫难日“全息摄影”图。

有关唐山地震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实文学作品，当年曾有一些，但由于种种原因，给予读者的多是那种“缩小了的灾难、放大了的人”的模式化文字。尊重人与事的本体的大型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可说是第一部，在距“7□28”劫难日近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有如此强烈的震撼力。

尊重人与事的本体，应该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基本素质。作者在《唐山大地震》中，对猝然袭来的自然灾害，不缩小，不讳言，而极写其肆虐、其暴戾、其戕害；对劫难中的人的力量，不放大，不夸张，而以科学的严肃态度去展示人的抗争力和坚韧性。两者相互映衬，巨大

的反差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濒死的拂晓”是极写灾难的华彩片段，内中有不少隽永的文字……而在那灾难的底色上，跃动着的是人——不屈不挠，生生不息的人！“渴生者”们如此，“在另一个世界里”的盲人、犯人、精神病人，以及蓝眼睛、褐眼睛的国际友人如此，那幸存的三千孤儿和十多万救灾部队亦如此。的确，当我看到那一位“极美的石化了的姑娘”默默无语地“睡”去时，当我听到盲人的三弦在无边的废墟上重新拨响时，当我随着“最后的五位男子汉”爬出矿井复见久违十五天的太阳时，我内心感受到了一股强力的冲击。我不否认，报告文学是一种主观色彩较强的文学样式，但若将过多的主观意识穿插其间，往往容易有悖于人与事的本体。在《唐山大地震》中，作家尽可能地避免了正面议论，而将主观意识溶化到对素材的筛选过程中，渗透于“冷静”的叙述文字里，更多地采用了白描这一传统手法，也采用了一些“口述实录体”形式，看上去平常，却标志了作者在艺术上的圆熟。

近年来的报告文学创作中，被评论家们誉为“全景”、

“全方位”的大型作品日趋见多，其中确实不乏成功之作。《唐山大地震》借鉴了一些“全景”、“全方位”的结构方法，选取不少颇为精彩的“点”，搭置了一个适当的框架。当然，框架并不等于容量，生活中不是常能见到长了一副大骨架而精瘦单薄的人吗？要写出气势，写出魂魄，写出应有的内涵，还必须对题材本身作高层次的思考和理解。《唐山大地震》没有直扑“抗震救灾”这一既便当又讨“巧”的角度，而是从人与自然的宏观角度去俯视。写自然，则极写自然之博大广袤、神秘莫测，可知的不可知的，矛盾的而又统一的，凡属那片废墟上的自然景观悉数录于笔下；写人情世态，除了上文提及的人的素质之外，笔触所至，也开掘出了某些正常人的反常——如“抢劫风潮”中的恶，反常人的正常——如犯人请求抢险时的善，至于在“‘方舟’轶事”一节中展现的那个“大家庭”的组合与解体，“政治的一九七六”所透出的反常思维和心态，更足以让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们去解释一阵子了；写人和自然的抗争与和谐，也时见高度的笔触辐射力，那发生在“饮恨者群像”中的科学

争论自不待说，那有关“7□28”这个“用黑色笔填写的日子”的史料、外电报道，又向我们传递了多少有价值的信息？而作者凝神于那条诡秘的北纬 40 度线的思考，围绕人和自然这个大主题所作的一番畅想，又为我们提出了多少新颖而有价值的问号啊！宏观的俯视，会产生大量的思想和艺术功效，《唐山大地震》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我记得钱钢说过，这个“结束语”最初的标题是“地问”，不知为什么舍弃了；我倒以为“地问”更见气势，即使以前有古人名篇《天问》，今人作一则“地问”又有何妨？

报告文学创作难免要依赖于采访，只是采访所得素材的有限和拮据，又常常使一些严肃的作家陷入苦恼。作者说他过去在接触某些题材时也曾有这种苦恼，但对于《唐山大地震》的创作，他却始终充满自信。原来，他在当年的唐山抗震救灾中有近三个月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没有这“近三个月”，也许他就不可能为我们勾画出唐山火车站前那些“脖子上挂着缝纫机头”、“腕上戴着两块手表”的孤儿，就不可能让我们听到那两只从动物

园逃出的、在凤凰山上“石雕一般”的狼发出的“酷似人声的凄厉嗥叫”，就不可能有那些带着泪珠的、腾着雾气的、沾着血痕的真切而透明、鲜亮而生动的一个个细节，更不可能发出“我和我的唐山”那样深情的呼喊！极而言之，如果不是那位“未谙世事的青年”身上揣着厚厚一叠寻人纸条，执拗地跟随上海防疫队奔赴唐山，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部长篇报告文学。

钱钢是把《唐山大地震》作为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毕业作品来写的。这当然不只是一份考卷，而是作者为今天和明天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地震学家、心理学家……为我们整个地球上的人们留下的一部关于大毁灭的真实记录，一部关于蒙受了不可抵御的灾难的人的真实记录，也留下了他的许多思考和疑问。作者在“我的结束语”中写道：“我在为明天留取一个参照物，以证明人类毕竟是伟大的。”

是的，人类毕竟是伟大的。

我和我的唐山

——引言

无疑，唐山是属于我的。

如果说，十年前那个脚蹬翻毛皮鞋、肩背手压式喷雾器、身穿防疫队的白色大褂，整日奔波在那片震惊世界的废墟上的二十三岁年轻人还没有意识到，生活已经把一片可歌可泣的土地交给了他，那么，今天当我再次奔赴唐山，并又一次挥别它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和我的唐山已经无法分开了。

不久前，我和朋友们在新华书店看见了一本《世界历史上的今天》。出于什么呢？我立刻把它取下书架，几乎是下意识地，随手翻到了那一页。

是的，那是一个注定要用黑色笔填写的日子——

7月28日

.....

1794 年 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和圣□朱斯特被处死

1914 年 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此开始

1937 年 日本占领中国北平

1973 年 法国在穆鲁罗瓦珊瑚礁进行第二次原子弹爆炸

1976 年 中国唐山市发生大地震

我又看到了我的唐山。我的灾难深重的唐山。我的伤痕累累的唐山。我的在大毁灭中九死一生的唐山。唐山大地震，它理所当然地要和世界历史、人类发展史上一切重大事件一同被人类所铭记。

唐山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忌日。这些年，每当 7 月 28 日凌晨到来的时候，唐山街头就有一些人影在晃动。悄寂无声中，亮起的是一小簇一小簇暗红的火苗。火光里映出的是一双双怆然的眼睛——老年人的，中年人的；也映出了他们手中一张张点燃着的纸钱：

我儿×××收
爱女×××收
父母大人收
.....

晨曦中，淡黄色的纸钱化作的烟，由絮絮缕缕渐渐融合成一片，如白色的雾，浮动在新建的高层建筑之间。纸灰在雾中飘浮着，它们是孩子眼中一只只神奇的黑色蝴蝶，飞得很高，又缓缓飘落，落在路旁草丛中，落在伫立街头的老太太的银色鬓角上。她们没有拍去它，她们的眼睛在痴痴地望着大地，不，是在望着地底下的那个世界；老人的嘴唇颤动着，在喃喃地诉说什么。

我曾不止一次走过那些飘飞过纸灰的街心。我理解，在唐山，“7□28”地震的死难者们是没有坟场的；那些高楼下的十字路口，那些窄小的老巷，那些在地震后重新堆起的小山，甚至刚刚圈定的厂房新址，都是他们无碑的墓地。十年前，他们就是在这些地方，被房梁砸倒、被楼板压碎、被瓦砾和落土活活窒息的。十年后，废墟

已不复存在，然而我认得出一切。我走着，从路边栽着拳头粗的小树的新修的干道，走向老树夹径的狭窄的老街。是一个无月的夜晚，我独自漫步在一条十年前曾去过的小路上，忽然发现，路灯下那一棵棵高大的老白杨，通体银白，闪着奇异的光。这些在大地震中，曾像浪中船桅一样剧烈摇荡过的老树，这些曾目睹过当年一幕幕惨状的老树，它们至今还在默默地、忠实地守护着什么呢？那一根根形状弯曲的枝条，使人想到它细密的根须。十年来，老树的根须一点一点地伸向死难者长眠着的大地深处，是在为地上和地下、生者与死者传递着什么音讯吗？

唐山大地震，是迄今为止四百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最悲惨的一页。中国地震出版社出版的《地球的震撼》一书，向全人类公布了这一惨绝人寰的事实：

死亡：242769 人

重伤：164851 人

每当我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我的心便会一阵阵发紧。

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8.2级大地震的情景是极为可怖的，强震引起的次生灾害——大火几乎焚毁了半个东京，死亡计十万人。

1960年5月22日智利8.5级大地震，引起了横扫太平洋的海啸，巨浪直驱日本，将大渔船掀上陆地的房顶；这次地震的死亡者，总数近七千人。

还有美国1964年3月28日阿拉斯加8.4级大地震，冰崩、山崩、海啸、泥喷，总共使178人丧生。

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它们意味着：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数，是举世震惊的东京大地震的2.4倍，智利大地震的35倍，阿拉斯加大地震的1300多倍！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数字背后人的悲惨命运。人们尽可以用数十亿美元、数百亿美元来计算物质财产损失，可是又能用什么来计算人的损失呢？活生生的人是无价的。

太难了，要想忘掉那一切是太难了。

不久前我访问过一位唐山妇女。在她家，她给我端出水果和糖，出于礼貌，我请她也吃。她却连连摇手：

“不，不！”她说，“大地震后，我就没吃过一点甜的东西……”她告诉我，她是在废墟中压了两天两夜之后被救出来的，出来后吃的第一样东西，是满满一瓶葡萄糖水。从此，一切甜的东西都会使她产生强烈的条件反射。苹果、橘子、元宵、年糕，甚至孩子的朱古力……这一切都会唤起她十年前在废墟里渴得几乎要发疯的感觉。

“我不能沾甜的东西，我受不了！”十年了，苦涩的滋味一直没有离开过她，一直没有……

“经过地震的人，都像害过了一场病。”另一位妇女对我说，“我一到阴天，一到天黑，人就说说不出的难受。胸口堵得慌，透不过气来，只想喘，只想往外跑……”她不止一次这样跑到屋外，哪怕屋外飘着雪花，刮着寒风，任丈夫怎样劝也劝不回来。她害怕！她是压在废墟中三天后才得救的，她至今还牢牢地记着那囚禁了她三天的漆黑的地狱是什么样子。平时只要天气变暗，当时那恐怖绝望的感觉又会回来，令她窒息。十年了，是什么无形的东西还在残忍地折磨着这羸弱的女人呢？

你，一位中年教师，语调十分平静，平静之中又透

着说不尽的酸楚：“那些伤心的事多少年不去想它了，忘了，都忘了。”真的忘了吗？当年，为了救出你的爱妻，你曾在废墟上扒了整整一天，是一场大火最终将你的希望断送。你告诉我，妻子是活活烧死在那片废墟中的，你当场晕了过去。怎能够忘记啊！那是一场可怕的火。采访中，曾有人捋起衣袖，指着臂膀上的疤痕对我说，大火烧化了亲人的尸体，这是滚烫的人油烫的痕迹……

还有你，老军人刘祜，我在你那冷清清的家里坐着，看着你竭力作出的轻松的笑，我真想哭。“地震前的那天晚上，我出差在天津，夜里十来点钟还跟家通了电话，是小女儿接的，她问：‘爸爸，我要的凉鞋你买好了没？’我说：‘买好啦。’她又问：‘是银灰色的吗？’我说：‘是的！’她问我好看不好看，还要我快快捎回去……”你说不下去，老泪顺着满脸的皱纹往下淌。十年了，你至今还珍藏着那双银灰色的小凉鞋，像是珍藏着女儿那颗爱美的活泼泼的心……

24万生灵仿佛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离去的。

1200人中有400人遇难的陆军二五五医院，是我这

次去唐山的住处。医院有一个小灵堂，保存着部分遇难者的骨灰盒。当我走进那间点着昏黄小灯的屋子时，我的胸腔立刻被塞紧了。所有骨灰盒上的照片，那一双双眼睛都是活生生的，活生生的。

一个扎小辫的女护士，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戴着一顶有檐帽，胸前还有一枚硕大的毛主席像章。一切都带着那个年代的烙印，只有她那楚楚动人的笑容是超越时间的，以至于十年后的今天，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如果说她曾把什么照片送给自己的恋人，那一定就是这一张。

有一个戴鸭舌帽的极可爱的大眼睛男孩，我简直不忍心正视他。他的骨灰盒上，放着一个小小的花圈，挽带上写着：

韩治安息。你的爸爸妈妈

旁边还有一个小花圈，上面是同样的字迹：

韩松安息。你的爸爸妈妈

他的弟弟，一个更小也更讨人喜欢的男孩。失去了这样一对可爱的孩子，我很难想象他们的父母是在用什么来支撑自己的生命和感情。

失去的是太多了。在小灵堂里，我不仅看到了一行行泪写的字，而且清清楚楚地听到了那些可怜的父母们凄婉而不绝的呼唤。

在一个小女孩的骨灰盒上，有一包剥开锡纸的朱古力，朱古力都化了。可怜的孩子！也许生前她并没有尽情地吃过她所爱吃的东西，但一切都已不能再挽回。这就是大自然强加给人间的悲剧！

灵堂里还有一个特制的大骨灰盒，由一大三小四只骨灰盒组成。这真是一组特殊的图案，它出自一位父亲的手，象征着人间失去了一位母亲和她的三个孩子。我无法想象，孩子们的父亲在亲手制作这只骨灰盒时，会是怎样的心情。孩子们都依偎在母亲的身边去了，独独扔下孤寂的他；究竟是死去的人更不幸，还是活着的人

更不幸呢？

灵堂外是一座小山。那是震后清理废墟时，用整个医院的断墙、残壁、碎砖、乱瓦堆成的。“山”上有石阶，有凉亭，有嬉戏的孩子——是那些未经过灾难的震后出生的孩子。石缝间，偶尔伸出一截截锈蚀的金属，那是十年前折弯、拧断了的水管、暖气管；站在它们旁边，我仿佛置身于一块死寂的黑色的洋面上，倾听着极深极深的大地深处传来的种种属于人的微弱的信号。常常地，于寂静之中，我会突然听到自己的脚步又重新踏上昔日废墟上的声音，听到那些埋在地壳深处的 24 万活生生的灵魂的气息，他们诅咒、叫喊、哀求和呻吟；他们在生命被撕裂的那一刻，尚未来得及去思、去想、去躲、去避，就被活活地剥离开了那个光明的世界，成了这地心深处大自然牢狱的终生禁囚。我又想起了灵堂中那些无辜的天真的孩子，也许因为他们的存在，致使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在痛苦地抽搐着。

这就是我的唐山。

十年前，当我——一个未谙世事的青年，从平静的

生活中一步跨到了堆满尸体的废墟上时，我只是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灾难”。尽管住在灾民的小棚子里，帮他们领救济衣、救济粮，排长长的队领一小桶水；尽管参加了护送数百名孤儿转移他乡……我只是感觉到自己像在一夜间长大了，却还没有理解生活的底蕴。而这次重回唐山，我忽然觉得，自己懂得些什么了……

是的，与那 24 万蒙难者相比，与唐山目前依然活着的人相比，我的确是来自另一世界的人。我仿佛第一次从灾难的角度观察我的民族、我的同胞、我的星球。这是残酷的，也是崭新的。如此惊人的灾变，如此惨重的浩劫，如此巨大的死亡和悲伤，我已经不能用正常的规范来进行思维。那些美丽得令人伤心的东西，那些亲切得令人肠断的东西，那些坚硬得令人发抖的东西，那些弱小得令人渴望挺身而出的东西，一切属于人的品质都俱全了。

这就是我的唐山。

1985 年的春节，我是在唐山度过的。除夕那天一早，我就听见噼噼啪啪的爆竹声，过午，那声音更响，及至

薄暮，满城的爆竹声已密得分不出点儿来，整个天空都被映得通红！我看见高楼上、大路口，那些年轻人正一个接一个地点燃挂鞭和烟花：闪花雷、菊花雷、“银龙吐珠”、“五献花”……听不见轻松的笑声，只是不停地放，放。我觉得那震耳欲聋的炸响声中，饱含着一种极为复杂的情绪。

十年前访问过的那位在废墟中压了 13 天的卢桂兰大妈，邀我去她家包饺子。在地震中失去了丈夫和爱女的孤独老人，似乎把我当成了唯一的亲人，她一口一个“孩子”，喊得叫人心痛。我要走了。拿起提包，忽然感到那么沉。原来老人在里面塞了半包玉田小枣！

我提着沉甸甸的包，在唐山的街道上走着。满地是爆竹的碎纸，空气中飘着火药的甜香。我的心沉甸甸的。

除夕的唐山，光明和黑暗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新建区灯火辉煌，而那些尚未推倒的“防震棚”里，只有暗暗的灯光。但那里有着真正的人间的气息，正如我这沉甸甸的包里装着的卢大妈那颗母亲的心。在文化路路口，我停住了脚步，我又看到了十年前看见过的那一株株老

柳树。当年，树下是聚集尸体的地方。老柳树枝条仍然不动，仿佛在此起彼落的爆竹声中沉思着历史。我的眼睛发涩。人们对这些老柳树的理解，也许远不如它们对人的理解呵。

24万人无疑是一个悲哀的整体，它们在十年前带走了完整的活力、情感，使得唐山至今在外貌和精神上仍有残缺感。一切似乎都逝去了，一切似乎又都遗留下来了。仿佛是不再痛苦的痛苦，仿佛是不再悲哀的悲哀。

正是这一切，促使我用笔写出我的唐山。我要给今天和明天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地震学家、医学家、心理学家……不，不光是他们，还有人——整个地球上的人们，留下关于一场大毁灭的真实记录，留下关于天灾中的人的真实记录，留下尚未有定评的历史事实，也留下我的思考和疑问。

这就是我的心愿。

第七章 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

“饿死他们！”“疼死他们！”“枪毙他们！”

在那些炎热、压抑、动荡不宁的日子里，唐山废墟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负罪似地低着头，疲惫、憔悴、痛苦；脚上的翻毛皮鞋灌了铅一般，滞重地、缓慢地、机械地踩在残砖碎瓦之上；缄默无语的脸孔上积满灰土，颜色沉重。他们很少与人交谈，即使开口，声调也是低低的，对于毁灭和死亡的理性反应，似乎正被一股更有力的情绪有意识地压抑着。此刻，只有极熟悉他们并理解他们的人，才能从他们充血的眼睛里知道，创伤和震动犹如另一座废墟，正死死压在他们心上。

他们没日没夜走着，看着，工作着。

图纸、卷尺、标杆。

工作服上的标记：“地球物理所”、“地质所”……

再看去，人们从仪器上发现了刺眼的字样：

国家地震局

是他们！

此刻，在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再没有一个专有名词，会像“地震局”般在这里遭到如此的诅咒和痛骂。唐山人的满腔怨愤，犹如一座火山爆发，沸腾着的岩浆，从这一个宣泄口中不可遏制地喷射出来。

失职。渎职。

二十四万冤死的生灵。

成千上万的伤残者和孤儿。

仇恨与愤怒一起，死命地挤向那一个小小的宣泄口。唐山人围住了那些“地球物理”工作者、“地质”工作者，他们要向这些“吃地震饭的人”讨还失去的一切。

地震工作者们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一双双逼视着的灼人的眼睛；一具具表情各异的死难者的尸体；那些孩子……都在他们心头留下了抹不去的烙痕。

然而，还有着的，便是那强咽下去的深深的委屈。

雨点般飞来的石块。举着扁担追来的大汉。脏话。唾沫。……他们的汽车被砸了。他们的仪器被扔了。人们拒绝回答他们的调查，反而要他们回答自己的质问。就连为地震工作者开车的司机，也会受到愤怒的质问。

饿极了的地震工作者，站在领救济粮的长长的队伍里。

“哪个单位的？”

“……地震局的……”

“请走吧，没你们的粮食。”

“为什么？”

“啊！你们还要吃饭呐？没你们的！”

……

累极了的一位女地震工作者，野外考察归来路上，拦住了一辆军车。司机是个年轻的士兵，他起初和气地请她上车，一路还说着话，可是当她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时，卡车突然刹住了。

“你下去！……下去！！”

重重的关门声。足以把女人的心震碎的关门声。汽

车愤怒地吼叫着。这是一辆洒过伤者鲜血的车么？这是一辆躺过遇难者遗体的车么？车吼叫着远去，甩下一个在荒野里啜泣的女人。

苦涩的泪水。多少地震工作者，在唐山废墟上流过这种委屈无告的泪水。他们能说什么？他们也是人，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羞辱，知道什么叫做饥渴；他们甚至同样地体验过，什么叫做被房梁砸断筋骨、被碎瓦割开肌肤的滋味儿。

唐山市地震台的分析预报组组长刘占武，地震时胳膊骨折。他在机场的死尸堆中整整躺了三天，裹着一条被雨水淋透的被子，疼得说不出一句话。第三天，他挣扎着起来，让人架着来到一个军队医疗队，排在长长的伤员队伍中。

“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大夫问。

“我，我是唐山地震台的……”

仿佛一颗火星引爆了一堆炸药，伤员群里发生了一阵骚动。

“大夫！别给他治！”

“他们还有脸活着！这些吃干饭的家伙！”

“疼死他们！”

“地震怎么没把他们震死！”

“别给他治！别给他治！”

能走的，拄着棍子围上来；不能动的，躺在地上挥着拳头。人们怒不可遏：地震夺去了他们的亲人，夺去了他们的胳膊、腿，或者是眼睛……他们能向谁去哭诉申冤呢？一位老医生挡住了愤怒的伤员，他说：“这是科学问题，怪不得做具体工作的人，他伤得这么重，我们不能见死不救……”他把刘占武扶进手术帐篷。然而，做完手术后，他也忍不住了：“同志，你们为什么没有预报？唐山死了那么多人，惨呐！……你们真的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发觉？”

刘占武泪流满面。他能说什么呢！

唐山人有权利，也有足够的理由倾泻他们的愤怒。地震工作是人命关天的工作，人民是把安危托付给地震工作者的。曾几何时，他们不也成功地预报过大地震、救过千千万万人的性命么？唐山废墟的一些断墙上，还

留着糊墙的旧报纸。1975年，辽宁海城，一次七点三级的地震被预报，成为轰动世界的奇迹，“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对反动的‘天命观’和‘地震不可知论’的有力批判”。可如今，一切又颠倒了。没有预报。突如其来的灾难。过去对地震工作者的那种笃信，一夜间变成了仇视。唐山人把那些旧报纸狠狠扯下来，撕得粉碎，扔在瓦砾堆上。瓦砾在嘲弄着宣传。受难者要寻找罪魁在哪里。他们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他们难道不能追寻一下悲剧的根源，难道不能对维系他们人身安全的国家地震预报部门发出一声悲怆的质问么？

唐山人并不是从未听说过“地震”这个词儿。从1974年6月29日国务院批转中国科学院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正式下达后开始，这个城市就曾多次进行防震演习。几乎每家每户的桌上，都放着一个倒立的酒瓶，据说酒瓶一倒就是地震，就要往外跑。有婴儿的家庭，把奶粉、奶瓶都放在离门极近的地方，以备逃离时随手带走。孩子稍大些的，父母就在他们的衣服夹层中缝进一些钱，这无疑是做了“万一他们失去爹妈”的

准备……唐山人由此认定，对唐山会发生地震，国家心里是有底的。可是为什么在大震临震之前却未吭一声呢？震后在唐山有一个近乎家喻户晓的传闻，说是搞业余地震预报的一位中学生都曾发出过“七月底有大地震”的警报，可是为什么国家地震局没有理睬？唐山人只能找到一个解释：开滦煤矿关系到全国的经济，国家害怕矿工们因为防震而不下井不出煤。不是也确有过那样的流传——谁要是散布地震消息，煽动煤矿停工，那就是“现行反革命”么？

在“七·二八”之后的几个月中，地震工作者的形象真是低劣透了。不仅仅是唐山人，还有天津人、北京人，甚至全国的人都在诅咒他们。“七·二八”大震他们未能预报，就连唐山地震的强余震预报水平也不高。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宽阔的长安街两侧、所有公园的草坪、体育场，以及一切空地上林立着防震棚。不要小看，这就是大自然的指挥权在发生作用。在那些日子里，“恐地震症”蔓延全国，各省地震局也频频发出地震预报，当时，全国有十七个省（市）的四亿人露宿

户外，甚至连香港人都惶惶不安。人们尚无能力建造如此巨大的防震棚，中国在秋风秋雨中打着寒战。

一切都准备好了，地震却没有发生。大自然的玩笑似乎开得过头了。

一封封愤怒已极的人民来信，飞向国务院，飞向国家地震局。人民要求法办渎职者，要求枪毙国家地震局局长。

这就是 1976 年爆发在人们内心的久久难以平息的震波。

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是谁，必须对这一切负责？

“吃地震饭的”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历史同样要求中国地震界作出回答。

1986 年早春，当我坐在原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的会客厅里时，我的面前，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稀疏的白发，深度近视眼镜。有一只眼睛似乎已近失明，另一只眼睛打量着我，显得很费力。他的身体深深地埋在

沙发里，像一块正在风化中的岩石。他的手心转着两只“健身球”，小厅里自始至终有着钢球磨擦时的机械、单调的声响。

“十年啦……”老人闭目长叹。

他告诉我，十年来，他天天夜里要吞服三片“安定”才能成眠。

“七·二八”在国家地震局

位于北京三里河中国科学院院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震局所在的办公楼，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和全北京所有的建筑物一样，发生了猛烈的摇撼。办公桌上的茶杯落在地，摔得粉碎；窗户的碎玻璃也如冰雹飞落，“哗啦啦”响声一片。楼道里回荡着“嗡嗡”的人的声响。地震之魔在袭击这个世界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小小地捉弄一下它的老对手。

局长刘英勇被惊醒了。他家厨房的煤气炉被震翻在地。慌乱中，他披了件外衣，趿拉着鞋，就往宿舍楼下

奔。他住在离办公楼不远的一座四层楼上，他以从未有过的速度直奔办公室。

“震中呢？震中在哪 ？！”

他喊出的第一句话，和所有前来询问的人的第一句话一样。

当时在值班室的高旭报告：北京附近几个地震台的测震仪，有的被震翻，有的记录出格。外地台的报告尚未收到。

当时中国大陆有十几个地震台构成测震基本台网，每次地震的震级都是根据各台给出的震级数平均后确定的。

4时30分，兰州、南京、昆明等十个台报来测震数据，其中给出震级的仅六个台，有的定八级以上，有的定七级以下，悬殊甚大。至于震中，大都只能确定在“北京附近”。

震中还是不明。

询问震中和震级的电话铃此起彼落！

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办公室来电话了解：什么地

方发生地震？震级多大？人员伤亡情况如何？

震级可能七到八级，“震中离北京大概不会超过二百公里……”高旭只能作这种回答。

电话里又传出中共中央一位副主席的声音：“叫你们局长！……”

刘英勇焦急万分。这位老红军出身的干部，此时完全被震懵了。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对专业人员们说：“别慌，别慌……你们只管工作，杀头坐牢的事我去，我去……”

“震中究竟在哪里？”

“七·二八”凌晨，国家地震局的各个角落都回荡着这个声音。电话铃声急促不断，交换台的红绿灯眨着眼似地闪烁。长途台、市内台纷纷呼叫国家地震局。全中国都在询问震中，全中国都在寻找震中。

没办法。慌乱的办事机构，落后的通讯反馈系统。强震发生整整一个小时了，国家地震局还不知道震中在哪儿。

仅仅相距一百五十多公里。

五点整，国家地震局做出决定，地震地质大队、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市地震队和国家地震局机关，兵分四路，立即开赴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在二百公里范围内寻找震中。

对于任何一个有自尊心、有事业心的中国地震科学工作者来说，这一决定无疑是刺痛心灵的。早在公元一百三十二年，东汉时期的张衡就研制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台地震仪器，他的“候风地动仪”能够检测出地震方向。而在一千八百多年之后的今天，面对仪器记录出格等意外的困难，人们却不得不用如此原始的办法去寻找震中。

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张魁三和计划处长高文学带队驱车向东，朝通县、香河一带急驰而去。

那一天的情景是惨痛的，高文学事后告诉笔者：那天清晨，汽车经过长安街时，透过车窗，看见街上到处是人，身穿汗衫、短裤，披着毯子，惊慌失措。北京饭店的外国人和小胡同中奔出的中国居民挤在一起，他们

都被这没有预报的灾变震慑住了。这一刻，没有任何人能向他们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切，更没有人能担保他们的安全。

高文学不敢看路边那些人的眼睛。当年他在清华大学、地质学院以及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攻读地质专业的时候，不是没有接触过世界上那些著名大地震的史料。然而，那些震例、数据都没能像今天这样使他的心受到如此强烈的冲击。自然的灾难。人类的灾难。他看见了一个不安的世界，看到了一颗颗战栗的心。一个自然科学家对人类担负的责任是如此重大，他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切地感受过。

震中究竟在哪里？通县？不像。房屋是倒塌了一些，可是并不厉害。香河？也不像。虽然已经看见了头破血流的伤员，可老乡说：“东边还厉害！”

吉普车继续自西向东，沿着既定路线寻找。军人出身的副局长张魁三骂骂咧咧。这个当年的军队老政工干部，此时正在干一个侦察排长干的事。他急，他火。可是他也不知道该骂谁。

道路上出现了裂缝。三河县！三河的破坏至少达到了烈度七度。也许这里就是震中？向北京报告，电话又打不通。张魁三和高文学急得跺脚！国家地震局连个电台都没有，可他们从事的却又是人命关天的工作。

终于与北京取得了联系。这一刻，他们才得到了确实的消息，值班员告之：震中不在三河，在唐山。

（确定唐山是震中的消息，是电信局系统首先报告的。因为在与各地联络的过程中，唯独发现唐山地区打不通电话。几乎同时，寻找震中的地震地质大队的人，在蓟县遇到了赴京报警的李玉林一行，他们也报回了“唐山全平了”的消息。当时约六点多钟，即地震发生后两个半小时。）

当日十时许，那辆裹满尘土的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进唐山市区。当悬挂在危楼上的死尸和整片废墟出现在眼前时，高文学和张魁三禁不住失声痛哭。

当震中基本确定的时候，国家地震局根据不完全的各台站报告汇总，初步确定震级为七点五级。新华社在第一条消息中公布的即这一震级。事实上时隔不久，各

台站都报告震测结果后，“七点八级”，这一经过核准的震级数据已产生。但是人们顾不上去更正了。北京正一片混乱。

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被召进中南海汇报。

随同前去的专业人员是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

“小汪，地震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我们的责任是推不掉的，推不掉的……”

刘英勇，这位行伍出身的老干部，理所当然地将科学的失误和战场的失败等同相视，把自己和军事法庭联系在一起。

“这次地震，你们事先是否知道？”

中南海。政治局委员们的目光逼视着刘英勇。

“我们，我们注意过京津唐地区……7月15日还在唐山开过群测群防会……当时没有发现五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国务院规定五级以上才能报……”刘英勇语无伦次，他反反复复地检讨，他请求处分，他说已经派人到震中区去了，他自己也准备立刻去现场监视震情……

“不！现在的问题是要确保北京！”一位政治局委员说，“你必须留在地震局，昼夜值班，随叫随到！”

会议的中心转到了确保北京的问题上。这一会儿，最高决策者们似乎还无暇追究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责任。

当日下午，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驱车赶往唐山。

这个五十年代的留苏生，在车上始终保持沉默。不是困倦，而是难以说清的郁闷。车外雨蒙蒙一片，到处是淋得湿透的避难者，孩子哭、老人叫、男人们在骂娘。雨刮器吃力地划动着，把大灾难的画幅一会儿揭开，一会儿遮上。

他能说些什么呢？中国地震界内部关于北京一带会否发生强烈地震的所有争论和重重矛盾，他都知道。那一切是多么纷繁复杂！

越往前方去，灾情越重，他甚至可以想象得出，遍地的灾民们如果知道这辆面包车上坐着的就是分管京、津、唐地区地震预报的组长，他们将会怎样蜂涌而上。

什么难以预料的事都可能发生。如果那样，他将怎样回答人们的质问？去大声申辩“唐山地震是没法预报的”？不。这不是真正事态的全部。“七·二八”之前的几个月，他们的目光是在密切地注视着京津唐一带，可是……

“十年了……”汪成民喟然长叹。从十年前的邢台地震开始，地震工作者有哪一天放松过对华北、特别是对京津唐地区的监视？这一地区，是全国范围内地震专业队伍最多、观察网点最为密集的地区。地震工作者们早就预感到华北大地下面潜藏着一个巨大的恶魔，他们紧紧盯了它十年，追了它十年，1976年眼看就可能抓住它的尾巴，它却再一次狡猾地溜过了人们的监视，蓄谋已久、而又从从容容地在唐山制造了这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

面包车颠簸起来。

夜色中的唐山。瓦砾。死尸。无表情的呆傻的人。

他难受。一种无从诉说的难受。一种难以解释的难受。他敢说，他自己和许许多多献身于地震预报工作的同事们决不是罪人，可是现在，他们的身上分明已经背

上了深重的罪孽。他能说些什么呢？

面包车停下了，去机场的路还没找到，车就被人截在道旁。

“快！给我们把伤员拉到医院去！”

“同志，对不起，”汪成民跳下车，“我们是北京来的，车上带着仪器，我们要尽快找到指挥部……”

“什么指挥部?! 救人要紧!”

“我们不知哪儿有医院，哪儿有大夫……”

“他妈的，你拉不拉？”黑暗中说话的大汉居然有一支手枪，“不拉，我就开枪了!”

7月28日的夜晚，国家地震局派往唐山监视震情的装有仪器的面包车，就这样，拉上了一个、两个……直至满满一车伤员，在无路的废墟上颠来颠去，徒劳地寻找医院。汪成民和那些奄奄一息的伤员挤在一堆，耳边满是呻吟，衣服染上了血迹。他忽然觉得，自己在这种时候还活着，还完好地活着，这本身就是巨大的痛苦和悲哀。面对殷红的鲜血，他能说些什么呢？他能说什么啊?!

汪成民到达指挥部后，通过电话向国家地震局正式

提出：“请立刻封存所有历史数据，以备审查。”

我坐在国家地震局的档案室里，面前是一大堆一大堆在保险柜里沉睡了多年的资料：中共中央文件、国务院文件、请示报告、会议发言……发黄的纸页。带有“文革”味儿的文字。除枯燥的数字之外，还有一些当年的豪言壮语之类。然而，就在这掀动纸张的单调的声响中，我被激动了，我嗅到了历史的气息。

尽管是在那个畸形的时代，是在那个所有人似乎都变了一副模样的时代，巨大的星球仍在依然故我地转动。而我们成千上万的科学工作者，那些忍辱负重的中国知识分子，仍在工作。那一堆堆发黄的纸页中，无不闪耀着一颗颗艰辛地探索着的心。

应当把这一段历史留给后代。

备忘录（一）

如果人们发现，在唐山地震一两年前，甚至早在邢

台地震之后，有关地震的许多文件中便已多次提到过“唐山”这个地名，那么，对国家地震局的简单的怨愤，也许会变成深沉的疑问：中国的地震预报在世界上并不落后，那末最终未能预报“七·二八”大震的症结何在？

也许一切都应追溯到邢台地震。

邢台地震标志着中国大陆地震活动一个“高潮幕”的开始。此前的一二十年间，除人烟稀少的西藏察隅在1950年8月15日发生过一次八点五级地震和西藏当雄1951年11月18日发生八级地震外，中国大陆，特别是东部，总的说是平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总共只有三位地震科学家：北京鹫峰测震台创办人李善邦先生、当代中国地震学权威傅承义先生和中国地球物理事业开拓者顾功叙先生。他们或是搞测震和地球物理研究，或是通过研究地震波来探索地球内部奥秘。那时没有地震预报工作——在平静的日子里，人们会把警铃的职能忽略。五十年代中期，苏联援建二百零五项目工程，在选址时需要考察历史上发生地震的情况，与长期地震预报有关的烈度鉴定工作于是才开始上马，当时人们的

眼睛还只是盯着历史。直到邢台地震发生，人们才被地震的现实危险性惊醒了。

1966年3月8日，邢台发生六点八级强烈地震后，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一大批从事地质学、地球物理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和大学生赶赴灾区。在前所未见的惨不忍睹的废墟、尸体、鲜血面前，他们第一次强烈感受到，一次未能预报的地震是怎样危及千千万万人，甚至震撼了一个国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乘坐直升飞机赶到邢台。当他站在一个木箱上，向灾民们发表讲话，勉励他们重建家园、战胜灾害之后，神情严峻地来到科学工作者中间。

周恩来说“这次地震，代价极大，必须找出规律，总结经验”，“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他交给他们的任务是：“要为保卫大城市、大水库、电力枢纽、铁路干线做出贡献。”

地震预报工作就在邢台匆匆上马。一切都是那样简单幼稚：科学工作者们到各个村子里，广泛搜集地震前兆，从动物异常、有感小震直到井水变化……像寻找仙

草神药似的寻找“预报方法”。“方法”二字成了口头禅，连炊事员卖饭时都要问一问：“同志！找到方法了没有？”

3月22日，邢台再次发生七点二级强烈地震，四天之后，3月26日，奇迹出现了。仿佛冥冥中有个神灵被这群人的虔诚所打动，它竟慷慨地真把大地的秘密透露出来了。在灾区的科学工作者感到有一连串的小震，小车司机报告说在路上压死了乱窜的老鼠……当小震平静时，人们根据刚刚总结出的“方法”——“小震密集→平静→大震”，感到有可能发生强余震。晚上八点多钟，收音机又受到奇怪的干扰。科学工作者们下决心发布“预报”。可当时他们连通过什么渠道发布都不知道：是要写报告呢？还是拍电报？他们中的朱传镇抓起电话向上级报告，话没说完，23时19分，六级余震发生了！

不管怎样说，这是中国地震工作者第一次成功的内部试报。它发生在国务院总理发出庄严号召仅仅十八天之后！复杂的科学问题在一瞬间变得那样简单，人们的自信心成百倍地增长。他们觉得邢台的经验太宝贵了，那些“方法”太灵验了。“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

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他们兴奋地背诵着毛泽东的这条语录，仿佛自己就要踏上自由王国的金色台阶。

真正的辉煌还在九年后的海城。

人们不能不承认中国地震预报研究工作进展的神速。1975年2月4日，地震工作者发布的预报，使得辽宁省南部的一百多万人撤离了他们的住宅和工作地点——仅仅在两个半小时之后，海城被七点三级强烈地震击中。在六个市、十个县的震区范围内，城镇房屋毁坏五百零八万平方米，农村民房毁坏八十六点七万间，却仅有一千三百二十八人死亡，占全地区人口的万分之一点六。

国外认为，成功地预报七级以上大震，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震后，美国、新西兰、日本、罗马尼亚、联邦德国等十多个国家的地震科学专家和国际学术组织的成员曾到海城考察。一位美国记者将海城地震的预报称之为“科学的奇迹”。

怎么不“奇”呢？早在海城地震发生前，国家地震局根据小震活动、地壳形变、地磁、海平面等四项异常，并考虑西太平洋地震带和四五百公里深源地震对华北的影响，以及华北北部近年长期干旱、气象异常等重要情况，就已将渤海北部列为地震危险区。辽宁省似乎是从从容容地建立群测群防队伍，派人到邢台“学习取经”，演兵布阵，挽弓以待，早准备决战一番。

怎么不“奇”呢？邢台的“方法”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套用到海城。那么多人熟知并能运用从邢台传来的口诀：“小震闹，大震到，小震一多一少要报告。”海城地震前三天，当有感小震频频发生时，大震的紧急报告便纷至沓来！

这是真正的奇迹！大震发生的当天上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向全省，特别是鞍山、营口两市发出做好防震工作的电话通报。下午，海城、营口召开研究对策的防震会议。于是，工厂停产，成千上万人被动员，甚至是被强令撤到滴水成冰的屋外。广场上停满了装着药品和食物的救援车辆。医疗队整装待发。连拖拉机也开出了

可能会倒塌的车棚。人们裹着大衣，在寒风里坐着等地震的到来。

这是真正的奇迹！地震发生前半小时，正在一个礼堂里参加军民联欢会的某野战军官兵和地方群众，接到紧急通知，于是会议临时中断，几千人安然撤出……

中国灾害史上奇特的一幕揭开了。暮色苍茫的辽南大地上，四处回响着“当当”的钟声，有线广播一遍遍发出严厉的警告，阻止快要冻僵的人返回自己的小屋。

营口市地震办公室主任曹显清，一个多次到邢台学习“方法”、对地震预报充满自信和热情、被人称为“曹地办”的小老头，仿佛在念咒似的，看着手表喃喃自语：“小震平静后，时间越长，震级越高。从中午平静到现在已经六个多小时了。七点震，就是七级，八点震，就是八级。”

七点三十六分，七点三级地震发生了！

四面八方，一片尖声呼喊。人们不像在惊呼天灾的可怖，不像在庆幸自己的存活，倒像在欢呼地震工作者的神机妙算。

海城，这是中国地震界的一枚金光闪闪的勋章。地震工作者来到海城地震现场，老百姓把他们奉若神明，视为救星。被这次成功的预报保存了生命的成千上万幸运的人们，欢呼着，夹道欢迎这些能够征服自然的英雄。彩旗、鼓乐、美酒……科学家们醉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一一握着地震工作者的手说：“今后能不能争取在二十四小时前预报五级以上地震？”

那时地震工作者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从海城辉煌的顶峰，一下子跌落到唐山的黑洞洞的深渊里去。

唐山地震后，有人认为海城的辉煌是报纸吹出来的，七点三级地震的预报，完全是碰运气碰上的，然而，如果人们冷静下来，不去纠缠于报纸宣传那些高八度的赞歌和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词，而把眼光投向无可增删的历史事实，他们便能作出判断：从海城地震全盘重演了“邢台方式”这一点说，“运气”似乎存在；可是人们能把监视范围缩小到辽南那一小片地区，这根本就不是哪个神仙暗示的结果。短期和临震预报的成功，离不开中期预

报的正确。而恰恰是这一点上，中国地震预报科学工作者在数年间作了大量艰苦细致、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研究。

辉煌决不是偶然的。

应当留下这段历史，包括某些极其重要的文献。辉煌是真实的，正如日后的灰暗也是真实的一样。这是科学走过的路。它会告诉人们：对于海城地震和唐山地震的追踪，是同一部大书的紧密相连的上下篇；区别只在于前者的结局是喜剧，而后者的结局却是悲剧。是同一批活生生的人，先后承受了巨大的欢欣和深重的折磨。

在各种文献上，“渤海”危险区总是和“唐山”危险区相提并论。

1967年3月27日，河北河间发生六点三级地震，造成的损失并不算大，但是北京和天津明显有感。这是非同小可的警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出指示：“要密切注视京津地区地震动向。”并责成有关部门部署北京、天津、唐山、渤海（“京津唐渤”）地区的地震工作，把该

区列为重点监视区之一。李四光教授也感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机。这位伟大的地质力学家的锐敏的眼睛，早就注意到整个新华夏构造体系正在活动。他从东西向构造的活动特点出发，强调要对唐山地区的滦县、迁安一带做些观测。

1969年7月18日，渤海又发生七点四级地震。这样，邢台地震之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华北北部连续发生了三次大于六级的强震，其发震地点有逐步向北东方向迁移之势。真正的有识之士已经警觉到华北大地进入了不寻常的躁动期。

中国地震界一批年轻有为的科学工作者，瞪大双眼在搜索着可能发生的强震。

有人的搜索方式似乎十分奇特。1972年炎夏酷热，北京市地震队科研人员耿庆国在去平谷马坊地震台的路上口渴难忍，向一位老农买西瓜。闲谈中，只听见老农长叹一声道：“俗话说，大旱不过阳历五月十三，可今天都阳历六月十五了，天还未下透雨，唉，今年呐，大旱是旱定喽！”

老农说：“我活了六十七年，还没有赶上像今年这么旱的，这可是个大旱年哟！”听到几十年不遇的大旱已成定局，耿庆国不禁心中一跳：他顿时联想起河北邢台地震和云南通海地震震中区的老乡都反映过震前大旱的说法。他很担心：1972年已成定局的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大旱区，是否也是将要发生强震的一种前兆表现？是否意味着会发生危及华北北部、特别是京津地区安全的强震？出自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紧迫的研究课题：研究1972年大旱与未来几年华北强震活动的关系！

当他在张秀臣协助下搜集到有关气象资料时，他惊呆了：1972年，华北及渤海北部大旱区面积达一百一十三万四千平方公里。当时广播里几乎也天天能听到关于“抗旱”的报道，山西的大寨人提出的口号恰恰是：“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

“没见过的大旱”，是否在预示一场没见过的大震呢？耿庆国一头扎入“旱震关系”的研究之中，他翻阅大量的资料，绘制图表，常常彻夜不眠……他的研究得

到了马宗晋的坚决支持。

1972年11月在山西临汾，董铁成主持召开了全国地震中期预报科研工作会议。耿庆国做了旱震关系报告，提出了他的发现：六级以上大地震的震中区，震前一至三年半时间内往往是旱区。旱区面积大，则震级大。在旱后第三年发震时，震级要比旱后第一年内发震增大半级。他强调指出：华北及渤海北部1972年出现了几十年不遇的严重干旱，这是一个发生两组七级大地震、甚至可能发生一组八级强震的旱区面积。华北及渤海地区1972年大旱，与1965年和1968年那两次大旱情形相似。而1965年大旱之后，发生了邢台七点二级地震；1968年大旱之后，发生了渤海七点四级地震。

1974年上半年，另一些地震工作者也通过小震活动、地形变测量、重力测量、水氡观测、地磁和海平面变化等方法，发现华北及渤海地区的若干异常情况。

地震的危险在逼近！

1974年5月31日，耿庆国在西颐宾馆北馆五单元北京市地震队所在地再次重申中期预报意见：

1972 年大旱后的一至三年或稍长时间内，在华北及渤海地区，特别是辽宁、河北、山西、内蒙古四省区旱区范围内，可能会发生七级以上大地震。

若在 1975 年以后发生地震，则震级可达七点五级至八级左右。

他提出：

1972 年华北及渤海大旱区的特旱带为：辽南的锦州—岫岩一带、河北唐山地区以及河北山西交界的石家庄—邢台—太原—忻县一带。

对上述特旱带及其附近地区（1974 至 1976 年）发生七级以上强震的危险性必须认真重视。

耿庆国呼吁：

请有关方面切实加强京津唐张地区和华北及渤海北

部地区的抗震防震和群测群防、专群结合的测报工作，特别要时刻警惕可能发生的波及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和沈阳的震级在七级以上，甚至在七点五级以上强震的危险性，几百天之内强震就有到来的可能!!!

在北京市地震办公室主任傅瑞峰的大力支持和安排下，1974年6月4日，北京市科技局党委常委白介夫、田夫、郑林、潘梁四人用整整一个上午时间，专门听取了耿庆国所做的《关于我国华北及渤海地区1972年特大干旱提出的旱震关系中期预报意见的基础依据和分析结论》的汇报。白介夫说：我们科技局党委坚决支持耿庆国的中期预报意见，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几百天之内，华北及渤海北部的一些地区就有可能发生七级半大地震，这是一桩大事。要立即把旱震关系中期预报意见向国家地震局和胡克实汇报。

1974年6月7日至9日，由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主持，国家地震局在一片报警声中召开了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会议给国务院的报告称：

会上对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地震形势，进行了分析。多数人认为：京津一带，渤海北部，晋、冀、豫交界的邯郸、安阳一带，山西临汾盆地、山东临沂一带和黄海中部等地区，今年年内有可能发生五至六级地震，内蒙的包头、五原一带可能发生五级左右地震。

其主要根据是：

京津之间近来小震频繁，地形变测量、重力测量和水氡观测等都显出较集中的异常。

渤海北部有四项较为突出的异常：全县的水准测量前几年变化很缓慢，年变化率仅零点一一毫米，但1973年9月以来，累计变化量却达二点五毫米处；大连出现二十二伽马的地磁异常；渤海北部六个潮汐观测站，1973年都测出海平面上升十几公分的变化，为十几年来所未有；小震活动也明显增加。

晋南临汾盆地近年出现地震波速异常。晋、冀、豫交界区和黄海中部小震活动都有所增强。鲁南临沂一带1968年发生八点五级地震前，外围地区地震活动频繁，

近年这个地区周围又开始出现类似情况。

还有一些人根据强震活动规律的历史情况及大区域地震活动的综合研究，并考虑到西太平洋地震带和四五百公里深源地震对华北的影响，认为华北已积累七至八级地震的能量，加之华北北部近年长期干旱，去年又出现建国以来少有的暖冬、冷春，干湿失调的气象异常，提出华北有发生七级左右强震的危险。但是也有人根据地球转速去年开始变快，和以往在此情况下华北很少发生强震，以及华北强震依次发生的时间间隔一般较长的情况，认为华北近年不会发生大于五点五级地震。

为了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以预防为主”的方针，接受江苏溧阳和云南昭通连续发生破坏性地震的教训，虽然会议对北方一些地区发生强震的分析不尽准确，但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切实加强几个危险地区的工作。

会议决定：“加强有关地区的协作。成立京、津、唐、

张和渤海地区两个协作组，京、津、唐、张协作组由北京、河北、天津的地震部门、地球物理所、地震地质大队、地震测量队组成，暂由国家地震局负责；渤海地区协作组由辽宁、天津、山东的地震部门组成，会议推定由辽宁负责。协作组应及时交流情况，大力协同，密切配合。”

1974年6月29日，也就是海城地震发生前八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下达国发〔1974〕69号文件，将国家地震局的报告转发给京、津、冀、晋、蒙、辽、鲁七省（区、市）。文件称：

做好地震工作是关系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项重要任务，望你们在搞好批林批孔活动的同时，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方针，把地震管理部门建立和健全起来。切实抓好地震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运动，加强防震抗震工作。

在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下达后两年多的时间内，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大地震活动确实空前地活跃起来，七省市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强烈地震的袭击或波及，相继发生了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七点三级地震、1976年4月6日内蒙和林格尔六点三级地震和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七点八级、滦县七点一级地震。海城七点三级强震和唐山七点八级强震、滦县七点一级强震，恰恰是发生在渤海地区和京津唐张地区这两个协作组的工作范围内。

历史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巨大功绩是不可抹煞的。

人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唐山地震临震未能预报，而轻率地否定“海城预报”在科学史上的价值，如同因为海城地震曾经预报，而把地震工作者围绕唐山地震的预报所作的一切努力一笔勾销一样。从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中，谁都能看出，地震工作者早已把唐山套在他们的瞄准镜内，应当说唐山地震的中期预报是成功的，

只是他们在临震预报的决断上最终失败了……

备忘录（二）

海城地震之后，一大批地震工作者的欢欣鼓舞的情绪似乎消失得很快。他们几乎全都被一个问题困扰着：海城七点三级大震，是否标志着自邢台地震以来华北地震活动的一个“高潮期”的结束呢？

华北。谜一般的华北！

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中，地球上部已变得破碎不堪，像一件古老的陶器，表面布满了裂纹。无数碎片构成一个地壳，华北地块便是这其中的一片。它的西界为贺兰山—六盘山构造带，北界为阴山—燕山构造带，南界为秦岭—大别山构造带，东界在海中。这些构造带附近常有从地幔侵入的超基性火成岩系、复杂的变质岩系和规模巨大的褶皱断裂系统。那里既是构造活动带，又是各种地球物理场的异常带，也是地震的活动带。在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印度洋板块三者相对运动的控制

下，华北这一块“碎片”常常处于不平静的状态。

但是现在呢？

海城之后，还有没有大震？

观点（1）：华北强震依次发生的时间间隔一般较长，华北大地该平静一阵子了。倒是中国西部更值得注意：从1969年到1974年，已连续发生云南通海、四川炉霍、云南昭通三次七级以上大震。应当更警惕西部的危险性。

观点（2）：海城地震后，华北地区的许多异常现象并未消失，大震的危险性依然存在！

这是一场极为正常的学术争鸣。谁都拥有一定的科学依据，谁又都没有充足的理由说服对方。一个旁观者，事先要想为双方轻易地作出裁决是既荒唐又浅薄的。当时谁也不能看穿地壳下的这一切奥秘。斗转星移，即使现在，这些自然科学家有时仍多少像一个占卜者，于一片茫茫之中去掐，去算……

常常，他们就像总在秒针的哒哒声中过日子。

然而，时间，构成这段历史的最客观的时间，究竟是怎样度过的呢？

史料摘录——

1976年1月28日——距唐山地震半年

国家地震局向国务院上报《关于京、津、唐、渤、张地区1976年地震趋势的报告》。

报告称：我局于1975年12月15日至1976年1月9日在北京召开了海城地震科技经验交流和1976年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议。会议认为，当前我国正处在地震活动的高潮阶段，估计近一二年内大陆地区有可能发生七级以上的强震。目前有较多异常显示，可能发生较强地震，需要重点加强监视的地区为：（1）滇西北及川藏交界一带；（2）四川、青海、甘肃交界的四川松潘—茂汶一带和青海的花石峡—都兰、乌兰一带。有发生五至六级地震背景的地区为：（1）京津唐渤张地区；（2）皖北、苏北、鲁东、豫东一带。

会议认为：“京津唐渤张地区今年内仍然存在发生五至六级地震的可能，但目前尚未出现明显的短期和临震

异常。”“从目前地震活动和前兆异常的空间分布来看，唐山与朝阳之间和京津之间两个地区尤应加强工作……。”

报告提出急需采取的措施和建议，第一条就是“继续贯彻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精神”。

1976年3月3日——距唐山地震四个月零二十五天

国家建委召开两市（京津）一省（河北）和国务院各部地震工作会议，介绍了地震形势。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到会做业务报告，解释京津唐渤张地区年内可能发生五到六级地震的预报。他说：“目前还没有出现短期和临震现象，比较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还不明确，因此马上动员群众采取临震的具体措施还不是时候，但防震抗震工作一定要抓紧。”

1976年4月6日、22日——距唐山地震一百一十三天、九十七天

6日、22日，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和河北大城先后发生六点三级和四点四级地震。震后，华北地区某些在海城地震后依然存在的异常现象消失。

这两次地震使地震工作者陷入了极大的惶惑。

1976年5月11日——距唐山地震七十八天

国家地震局在北京军区招待所召开分析预报人员紧急碰头会，分析和林格尔和大城地震后京、津、唐、渤、张地区震情。

不同意见仍在延续。

观点（1）：这两次地震使那些令人不安的异常已经“交代”了。海城地震后华北发生大震的可能性已经基本排除。至少，蕴藏在地壳内的应变能量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得到了释放。有人提出，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中的华北有震的估计可以宣布到期撤销。

观点（2）：对京、津、唐、渤、张地区的异常，用

内蒙六点三级地震来解释，方位似乎偏西；用大城四点四级地震解释，震级又似乎太小。并且，他们注意到京、津、唐地区在四月间新出现的“宝坻地电”、“昌黎地磁”、“滦县水氡”、“香河水准”等四项异常。

持以上两种观点者一致认为，目前尚未出现较强地震的临震迹象。倘若近期有震，震级不会太大，约四至五级，地震要注意渤海西部及其沿岸地区。

对于更长时间的趋势，会议决定在八月间另行开会会商。

为准备下次会商，会议从技术方面布置了五项工作，中心精神是要各单位提出对趋势的估计。

1976年5月29日——距唐山地震六十天

云南龙陵发生七点四级地震。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主任丁国瑜赶赴地震现场工作。

专业人员又一次感到情况紧迫。几天后，当四川大邑出现一些异常情况时，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

梅世蓉奉命风尘仆仆赶赴西南。

1976年6月21日——距唐山地震三十七天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刘德富根据气象资料分析，发现唐山地区出现1969年渤海七点四级地震前的类似气象现象。中国东部形势也日益微妙。

1976年6月26日——距唐山地震三十二天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黄德瑜根据小地震活动分析，认为渤海西岸有问题。

1976年7月5日——距唐山地震二十三天

北京市地震队耿庆国发现北京地区一周来的气象要素中，出现四项异常：

日降水量——6月29日突破历年同日降水量的最高

值；

日平均气温——6月30日至7月4日连续五天突破历年同日平均气温最低值；

日最高气温——7月1日和7月4日分别突破历年同日最高气温的最高值；

日最低气温——7月3日、4日连续两天突破历年同日最低气温的最低值。

只有日平均气压这一项指标还没有出现异常。耿庆国认为，只等低压指标突破，就可能进入临震状态。他立刻赶赴唐山、天津、廊坊收集气象资料。

1976年7月12日——距唐山地震十六天

似乎又是一次“蓄谋”中的戏弄，一次“地震会议”的会址，竟然选在唐山。据国家地震局干部周英志回忆：12日，出席京、津、唐、渤、张地区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的代表陆续到达唐山。到火车站接站的工作人员，手举“地震会议”的木牌，引起了过往行人的注意。

“怎么？唐山要地震？”人们纷纷询问。

“没事！我们交流经验……”

同日，国家地震局党的领导小组召开“批邓反右”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批判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会议形成的上报科学院的紧急报告称：“胡克实一贯紧跟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次又大刮右倾翻案风，他的问题的性质是正在走的走资派。……鉴于此，已不宜再主持局党的领导小组的工作，应免去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检查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在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伙抢班夺权的滔滔浊浪中，国家地震局也没能成为安定的绿洲。三里河的大楼和中国的无数大楼一样，充满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

1976年7月13日——距唐山地震十五天

北京市地震队已有华祥文提出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活动性异常、耿庆国提出旱震关系和短期气象

异常、李宣瑚提出该区水化学氡含量异常、陈克忠和刘惠琳提出京郊大灰厂形变异常，以及其它人提出京、津、唐、渤、张地区地磁场总强度异常、地下水位异常和地电异常，累计七大异常！

当晚，北京市地震队在队长邢景孟的安排下，由业务组组长鲁连勤和副组长张国民出面向北京市科技局党委书记白介夫汇报。白介夫指示：要以临震姿态投入工作，并立即把震情危险性向国家地震局做汇报，听听国家地震局的看法……

1976年7月14日——距唐山地震十四天

北京市地震队发出工作简报第二十九期《关于加强当前京区震情监视的意见》。

简报称：“北京及其周围地区应力场正在增加，从今年下半年起，发生五级以上地震的趋势背景正在加强。在当前的地震形势下，为完成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首都的光荣政治任务，按照（北

京市科技局) 党委指示, 我队全体同志必须紧急动员起来, 高度警惕当前地震前兆的发展和变化, 用临震的姿态密切注视京区的地震动向。”

同日, 国家地震局汪成民接到北京市地震队张国民的电话。张国民汇报了北京队的“七大异常”, 并要求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详细汇报。汪成民经请示已从四川回京的梅世蓉副主任和局领导, 答复张国民:“要求给一周的时间, 以便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 并派人到天津、唐山等地了解一下那里的异常情况, 再听取北京队的震情汇报。”听取汇报时间定为 7 月 21 日。

同日, 地震地质大队依据京区各台站地应力突跳异常, 提出短期预报意见。

1976 年 7 月 17 日——距唐山地震十一天

唐山。“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会场。

刚刚赶到那里的汪成民要求在会上作震情发言, 会议主持人查志远因“日程安排较紧”而未同意。汪利用

休息时间召集部分代表座谈。他的谈话要点：（1）近来情况较多，大家要注意。我们注意的重点是唐山、滦县一带。（2）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临震突变异常不多，希望大家提供。

汪成民向代表们散发了三百多份调查表，要求大家填毕寄国家地震局。表格样式为：

省 县（台）		填表日期	
地 点	手 段	条 件	76 年以来出现过几次突变异常？ （时间、幅度、特点及原因分析）

（这些表格，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地震前大都没有收回。地震后一二日，有表陆续寄到。）

7 月 17 日，北京市地震队分析组地应力组根据地应

力手段出现的异常，提出7月17日至23日，在北京八宝山、紫荆关断裂带有四级左右地震，北京外围邻近地区有六级左右地震。同日，北京市地震队平谷马坊地震台张秀臣也提出该台观测资料出现短期异常。

1976年7月21日——距唐山地震七天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未能如期于此日听取北京市地震队震情告急汇报。

张国民打电话给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梅世蓉认为自己掌握的情况还不多，提出待赴唐山了解异常情况的汪成民从唐山返回后再进行会商。时间定在7月26日。

1976年7月22日——距唐山地震六天

汪成民回京。

唐山之行并没有发现更多的临震异常，还没有充足

的依据，发出京、津、唐临震预报。

鉴于国家地震局党组正忙于政治运动，很少过问业务工作，汪成民等人将震情抄出，贴在局长刘英勇办公室门上。

其一：

趋势预报：

1. 北京队：

今年下半年，发生大于五级地震的趋势在增加，今后地震能将转移到北京地区，要紧急动员，用临震姿态注意本区地震。

2. 天津队：

大于五级的背景仍然存在，7 月份在天津以东及渤海可能四点五级地震。

3. 地球所：

京津附近，似在孕育较大地震，特别是 10 至 11 月，要注

其二：

短期预报：

1. 河北队：7月15日前后，红山、沧州、德州 > 四点
2. 地震地质大队：7月6日、7月20日或8月5日前后
—繁峙—张家口或宝坻—乐亭—渤海，五级左右。
3. 海洋局情报所：7月20日至10月20日，张家口—秦皇岛—
沧州，三点五级到四点八级。
4. 地震测量队：7月23日至7月31日，京西北（大同—
内蒙、山西交界）或京东南，四点五级左右。

1976年7月23日——距唐山地震五天

北京地区日平均气压九百九十一.九毫巴。这既是自1951年以来这一天日平均气压的最低值，也是自1976年1月1日以来二百零五天中逐日平均气压的最低值。耿庆国从震例中归纳的“短期临震气象要素五项指标”，在北京地区已全部完成。

1976年7月24日——距唐山地震四天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为准备与北京队会商，召开会商准备会。到会者谈及各种异常，梅世蓉副主任听得十分仔细，但会上没有提出结论性意见。大家认为，须待与北京队会商后决定。

同日，北京市地震队也召开会商准备会，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几位专业人员根据各自的监测手段，提出短期预报的看法。

华祥文：7月底8月初，京、津、唐、张地区将发生五级以上地震。

张闵厚：依据磁情指数异常，发震危险点是1976年7月26日“±”两天，将在京、津、怀来、唐、渤、张地区发生四级以上地震……

耿庆国：你如果能把预报震级提到五级以上，我就将敢报包括北京、保定、张家口地区在内的京、津、唐、渤、张地区马上会发生六级以上地震，时间是1976年7月29日之前！

李宣瑚：7月底8月初，将在京、津、唐、渤、张

地区发生五级以上地震。

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最后说：由于我队掌握各种异常情况都已及时报告国家地震局，正式的预报意见，可在两家会商后再定。

当晚收到通县西集地震台廖官成报来的意见：7月27日前，北京附近二百公里范围内，要发生五级以上地震。

1976年7月26日上午8时许——距唐山地震四十四小时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一行十五人，由汪成民等人带队，前往北京市地震队会商。

面前的情况是：对于京津唐地区的发震可能，中期预报早已作出（以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贯彻为标志），中短期异常也已出现（以北京市地震队“七大异常”为标志），但是临震预报——即有较为明确的地点、时间、震级的预报，尚难作出。

会商双方一致认为情况严重，震情紧迫感是客观的，也是空前的。但对京津地区如何报，感到不能轻率。尤其是北京。正如有人说的：“四川北部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停工、停产、疏散……京、津、唐地区再闹一下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问题的关键已很清楚：要立刻向领导汇报，不惜像海城地震前那样，冒人心动荡、停工停产的危险，公开发动群众，大量捕捉临震前兆，抓住了前兆，才能做出明确的临震预报。

1976年7月27日上午10时——距唐山地震十七小时

在汪成民等人再三要求下，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张魁三听取分析预报室汇报。参加者有副主任梅世蓉，专业工作者汪成民、张郢珍、刘德富等人。

介绍震情的汪成民事先写了汇报稿，他念道：“局领导：自七月份以来，京、津、唐、渤、张地区有些台站

在原有的前兆异常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各有关单位的预报较多，调子较高。据统计，今年以来我们共收到对京、津、唐、渤的预报计四十八次，仅7月份就有十次，其中七次是7月中旬以来收到的。”

汪成民念了与贴在局长门前的“大字报”内容相同的一段文字，接着说：“如何处理京、津地区震情，是项十分重大严肃的政治任务……我们认为可能发生较大地震的背景是存在的，北京队已提出自建队以来最突出的异常形势，但大家都同意何时发震要看临震异常。我们已发了表格，但收到还不多。昨天收到廊坊水氡自记突跳异常的报告，这种手段在过去几次大震中反映临震较好，情况值得重视。我们要紧急动员起来，密切注视情况的发展，采取什么措施，请领导赶快研究一下！”

军人出身的张魁三副局长：“说了半天，你们的意见呢？你们分析预报室有什么倾向性看法？……你们有没有掌握什么规律性的东西？……”

与会者无言以对。

会议由技术人员出身的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最后拍

板：“鉴于目前科学院会议较多，这样，一、你们拿出京津地区的详细资料。二、下星期准备一周，要圈出几个危险区，然后派出队伍去抓地震。三、明天派一辆车到廊坊，落实水氡异常。”

参加会议的主要人员都表示同意。

会议于中午结束，此时距唐山地震发震时刻只有十五个小时了。

地震出版社出版的《1966—1976 中国九大地震》一书中，第四页上在谈到唐山地震未能做出临震预报的原因时，这样写道：

1976年7月28日唐山七点八级地震，造成二十四万余人死亡，这是本世纪来伤亡最大的一次地震。1976年初召开的年度地震会商会上，曾估计唐山—辽西地区有发生五至六级地震的可能，并建议加强该区的工作。五六月间河北省地震局曾派出唐山地震工作小组赴唐山调查，而且有几人就在唐山大震中遇难。但为什么未能

像海城地震那样做出临震预报呢？这是因为，总的说，我们对地震规律的认识能力还很差，在工作上，我们认为可能还有以下几点重要原因：第一，对基本形势估计的错误。1975年海城七点三级地震后，在海城周围几百公里的范围内，近年内还会有七级以上强震发生吗？虽少数人据地震活动和气象异常，认为有大震背景，但多数人抱有怀疑。所以，虽然看到唐山—辽西一带存在异常，也只作为有五至六级地震的背景区加以注意。第二，4月6日在唐山市以西五百三十公里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和林格尔发生六点三级地震，震后京、津地区原有一部分异常现象消失，同时，天津西南大城4月22日还发生四点四级地震，相当多的人认为这些异常和这两次地震有关。第三，地震前几十天至几天，震中区及其周围没有获得大量的突发性异常的报告，也无前震，因此，未预计到地震会来得那么快、那么大。第四，京、津、唐地区的地震预报的发布，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十分严重的社会影响问题。

历史记着他们

唐山地震九年之后，当我在采访本上记下那一页页极为重要的史料的同时，无意识之下，在我的笔记本中也出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形象。在国家地震局采访期间，我常常忘记了采访本身，而深深地陷入了对那些饮恨唐山的地震工作者的苦苦理解之中。吸引我的，是他们的兴奋、愤怒、茫然……那些复杂的心理与感情。

那个每天夜里要服三片“安定”才能成眠的老人刘英勇，如今已经快要被人遗忘了。

刘英勇是位老红军，刘志丹手下的陕西省委少先队总队长。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人。1936年就是地委书记。解放后的地质部矿产司司长。他那时说什么也不愿意呵。“地质？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都不懂。我光认得一个碳、一个铁。我是小学生……”可是中国革命需要这样一批小学生逼上梁山，不管他们要完成的那个人的转折是多么艰难。他的本钱只是他的忠诚。他几乎走遍了

全中国的大山，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高度他都去过……他曾经生机勃勃地工作过，甚至还取得过令人炫目的成就。

可那毕竟是寻找宝藏的事业。找到矿，立刻会得到荣誉，找不到，谁也不会拿着手铐来找他。他后悔 1969 年秋天答应老部长李四光的要求，出任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领导成员，以至后来出任国家地震局局长。起初他对这个职务还有几分珍视，一上任第一件大事是为地震局争得了一块国家部级单位的大牌子，和一个部一级才能有的大铜印。至于具体工作，他也想由外行变内行，可是这个“变”却远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他的确没有想到，当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的时候，坐了轿车到国家领导人那儿去负荆请罪的，注定是他而不是别人。

地震灾害迫在眉睫的那些日子，也是刘英勇在政治灾难的漩涡中整天提心吊胆的日子。在国家地震局的上级单位中国科学院，复出工作才一年的领导人胡耀邦、李昌已被打倒。在地震局，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也被斗靠边。那是一段恶梦般的日子。他事后不止一次向人们说起：地震前，他的主要精力在于应付政治活动，“我天

天权衡：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哪个文件非我传达不可，哪个文件我可以推给别人……”

回首往事，刘英勇认为他这一生中“吃了两个大亏”：第一是读书太少，弄到后来成了一个不懂业务却又不能不管业务的尴尬角色。第二是从小近视。这双眼睛，使他 1936 年失去了一次到军队当领导干部的机会。如果日后当个将军，哪还会遇上唐山这样一个人生路上的万丈深渊呢？他时常叹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胡克实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 我。“文革”前，他和胡耀邦、胡启立并称团中央“三胡”，“文革”一开始，就成为被打倒的重点人物。直到 1974 年，他才复出，担任国家地震局党的领导小组组长。唐山大地震前后，他受到的冲击是双重的。

“七·二八”大震发生两小时后，胡克实就从北京东城赶到了一片混乱的地震局。他是地震局的负责人之一，可是，他此时只能坐在墙角，没有一个人向他请示

汇报。这并非疏忽和遗忘。

1976年1月，在中国科学院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的大会上，一个造反派点名批判了胡耀邦、李昌和胡克实。半年来，和胡耀邦、李昌一样，胡克实被剥夺了领导权力，纠缠他的，是无休无止的批判会。他愤懑无语，更忧心如焚：中国，失去了周恩来、朱德两位伟人的中国，在1976年夏天已经走到了什么样的边缘？而自然界的灾害，仿佛又和政治领域的灾难勾结而至！

人声嘈杂的地震局防震棚里，前国家地震局负责人胡克实找到了属于他的工作：传接电话，贴信封，发震情……

他还能干什么呢？

一种什么样的痛苦和折磨呵！

梅世蓉很忙。我们只在办公室握过一次手。她不是有会，便是有外事活动。有一段时间又患病住院，去外地疗养。我们一直没有机会长谈。她托国家地震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转告我：“是否不谈了吧？”这是使人感到

遗憾的。她是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主任，曾为全国妇联第四届执委。

梅世蓉的丈夫林庭煌，是现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我从他那里得知，梅世蓉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她是重庆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毕业后被分到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工作，从此便与地震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56年她作为苏联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研究生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勤奋、刻苦，甚至到了拼命的地步。留苏之前她已二十七岁，为了突击俄语，累得骨瘦如柴。回国后，很久家里不起伙，总和丈夫吃食堂……

她的事业是一个艰辛而艰难的事业。

她不是没有注意过华北地震危险问题。1970年10月，她曾写过《从华北地区强震活动的规则性，论危险区划分的一个途径》一文，提出：“今后十余年内，应当特别注意的有以下四个地区：（1）山西、河南、河北三省交界地区；（2）辽宁沈阳、锦州、辽东湾至渤海；（3）天津、唐山、渤海湾；（4）北京以西怀来、蔚县一带。”

当海城地震和以后的和林格尔、大城地震发生后，她于 1976 年 5 月主持召开了京、津地区震情会商会，在对异常的分析、认识的很大分歧面前，她感到“要想作出明确的震情判断是困难的”。她曾“准备八月份再开会讨论”。同年 5 月 29 日云南龙陵地震后不久，她被派往四川工作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返京后又负责主持京、津、唐、渤地区震情分析预报工作。7 月 26 日，她因为要起草关于四川震情的材料，而没有参加北京地震队的会商。

“七·二八”大震发生时，被惊醒的梅世蓉呆呆地对丈夫林庭煌说：“唉，又没有预报！又没有预报出来……”后来，当她看到河北省地震局一位在地震中失去了丈夫的女人时，难受地哭了。

唐山大震后，梅世蓉于 1982 年亲自主编了《1976 年唐山地震》一书。其中第十七章《问题与启示》是她执笔的。她剖析了唐山地震的复杂性，包括“主震之前无明显前震”、“大震前区域地震活动图像复杂”、“四月份发生的和林格尔六点三级和大城四点四级地震之后，京、津、唐、张地区的地震活动空前平静”、“宏观异常

出现很晚”等现象，认为“以上这一系列复杂的情况给震前的预报、震后的趋势分析造成了极大的问题”。

梅世蓉围绕“地点、震级、时间”三要素总结了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教训。她写道：

以往常从大断裂的交汇部位，断层的拐弯、端点等地方去寻找强震地点，而唐山地震表明，这种方法值得改进。唐山七点八级地震的震中不在深大断裂上，而是在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唐山断裂带上。显然，用上述方法看待唐山，唐山不可能被划为具有强震危险的地点。

唐山地震预报失败的教训之一是震级判断与实际相差太远。如果说震前在地区上从大的方面看还有所估计的话，在震级上，可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震前的地震地质工作没有指出这个地区可能发生七级以上地震，历史地震资料的分析也未指出这种可能。对于已经出现的一系列异常现象，震前又缺乏认识，对趋势异常的几次大转折也作了错误的判断。结果将完整的异常过程切成数个时段，大范围的整体异常被解成数块，分别

当作别处已发生地震的反应，预报了一些客观上后来没有发生的中强（五至六级）地震，而未报出唐山地震，教训是深刻的。

……

强震时间的预报问题……不认识短临前兆又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梅世蓉写下这些鲜血换来的教训时，她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汪成民常在他那间桌上推满了书、床上也堆满了书的小屋里接待我。一开始我就发现，他有许多话要说，可那些话都在一个“保险柜”里锁着——他并不信任我，既怀疑我对唐山大地震的熟悉程度，也怀疑我的理解能力。但是我们彼此间终于有了桥梁。令我十分吃惊，某一天，他拿出了许多极其重要的史料。“一切都要经受历史的检验……”那一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汪成民那严肃的、沉重的、内涵十分复杂的目光。

在 1976 年 7 月 27 日上午的汇报会上，汪成民作为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被一种巨大的责任压得透不过气来。半年来，他已三次去唐山一带核查异常情况，如此关注一个地区，在他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可是他不能像耿庆国那样大声疾呼，甚至断言“首都北京将晃一次房子”。他的身份要求他拿出更精确的论据、更权威的意见，然而他毕竟没有。

他清楚，万一漏报，一场大地震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

他也清楚，万一虚报，在京、津地区会造成什么样不堪设想的动荡。

北京，中国的政治中心，中南海住着毛泽东主席！
京、津地区又是经济中心，一天的产值近两亿元！

周总理在世时，国务院一位领导人曾说：“北京地区的防震演习必须总理批准方能进行。”京、津地区的地震预报，是一个极其敏感又极其重大的难题。

对于华北地区潜伏着的这个大地震，地震工作者已

经追踪了那么久，那么久！他们百倍警觉，枕戈待旦，从判别方位到概略瞄准……可是当急需精确瞄准的时候，瞄准镜中却看不清那个恶魔。它藏在哪里？它会在什么时候兴风作浪？看不真切，看不真切啊！

他只能寄希望于再捕捉一些临震前兆，特别是有感小震，像海城那样，如果开始“小震闹”，再紧急动员防震还是来得及的。最后的一线希望。

谁能想到，唐山根本没有重复海城的发震过程。“七·二八”之前八十一天中，唐山地区微震也无，异常平静。7月27日汇报会之后仅十几小时，唐山大地震在没有有感前震的情况下突然爆发！

这一切都是多么的难，多么的难啊……

耿庆国今年四十五岁，是傅承义教授的门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地震专业首届毕业生，人称“耿大炮”。人们说他是“敢报大震的人”，可那话，多半是一种揶揄，一种笑谈。有趣的是，在耿庆国那地面上布有灰尘、桌子上堆满书籍数据的书房里，我见到了一副

用篆字书写的对联：“归云有象藏明月，渔父无心放小舟。”那是他的父亲——第一位将自动电话引进我国东北的爱国教授耿晖老先生书写的。可是耿庆国并不像一个宁静而淡泊的“渔父”。他血气方刚，锋芒毕露，说话总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是的……！”“是的……！”他用一连串欧化的句子，慷慨激昂地“演说”着。末了，给我续茶。“喝水！吃这个……”于是，我们俩一粒粒嚼着从马路对面的小饭馆买来的盐水花生，又继续展开关于“七·二八”地震问题的热烈讨论。

耿庆国在7月26日之后的一天 陷入了空前的焦躁不安。他和同伴们像猛虎一样咆哮过了，可是引起了多大震动呢？从研究旱震关系开始，他对研究地震气象学问题入了迷。他认为，震源是下垫面内的热源，震源体是地壳和上地幔中的聚热体，上地幔和下地壳局部融熔产生的地热异常变化，和岩浆物质上涌活动与地震之间有着成因上的密切关系。研究地震前兆，光从力学角度是不够的，更要考虑岩浆活动、地热变化这一重要因素。

地下变热，地面变干，在孕震过程中肯定有气象效应存在。他相信自己的研究，但这种研究并没有为多数人所接受——因为地震预报这一课题，只能通过地震预报实践来验证！

地震工作者常常感到自己像个中医。他们凭经验、凭感觉能发现大地的病症，可是缺乏“解剖学”意义上的论证。耿庆国从北京地区气象要素指标的特大异常，感觉到大震将临，认为：至少首都北京将晃动一次房子！然而人们无法对他的意见确信不疑。尽管他的预报十分尖锐、惊人，但他仅仅是从气象异常这一个角度提出问题，理论依据还不完全。他根据 1972 年华北及渤海地区大旱所提出的七级大震中期预报，被海城地震所证实，但他关于石家庄—忻县有大震的预报却落空了。至于用气象要素异常预报地震的临震要素，他说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成功把握。（唐山地震后，耿庆国也虚报过一些未发生的地震，有人对他的预报有如闻牧童呼喊“狼来了”的感觉。）

7 月 24 日晚，耿庆国步履沉重地回到家里。老父亲

耿晖教授从“牛棚”出来后住在鼓楼一间破旧的小屋里。在饭桌上，耿庆国对父母说：“当前震情紧迫，几天之内就有可能发生强震，要波及北京，要晃房子。我要随时准备出差去现场考察，或在单位留守值班。如果我下班后没回家，你们不要着急，肯定有紧急的震情要处理。如果有临震预报发出，您们要听招呼。如果没有临震预报发出，地震真来时，爸爸和妈妈要赶快钻床底，来不及钻床底就裹上被子。千万别往外跑，跑出来反会挨砸……”

在说这些话时，耿庆国感到一阵阵心酸痛楚。海城地震后，唐山地震前，即1975年2月至1976年7月这十七个月里，他和王福山、贺国玉等人一起专门向北京市人民宣讲防震抗震知识，以防备大震的突然袭击。耿庆国本人应邀分别在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一机部、中央气象局、总参气象局、北京市各区县局、大型厂矿企业、中国科学院动物所、自动化所等科研单位、一些大中小学向成千上万人做了地震形势和防震知识的宣传报告。然而，在大地震发生前夕，作为地震工作者，他

不能向千万人报警，却只能悄悄地给老父母捎个话。他算什么呢？

“七·二八”大地震发生时，耿晖教授的小屋塌了一面墙，老两口记着儿子的话，赶紧裹上了棉被，结果“连土都没有吃”。

母亲对其他儿子们说：“庆国打过招呼……”

耿庆国的兄长们气极了！地震后几天当他们见到弟弟时，一齐用激烈的言词斥责他：“你们是怎么搞的？！使国家损失这么巨大!!! 你原来知道有地震！既然你能通报家里，为什么不能通报唐山人民，为什么不能通报北京人民！”

耿庆国呜呜地哭了……

他能说些什么呢？

使他痛苦万分的还有一个来自唐山的噩耗：他的同窗好友、河北省地震局派往唐山进行地震地质考察的技术人员贾云年，在唐山以身殉职！

贾云年并不是搞短期临震预报的，他的本职工作是研究华北地区地震的历史资料，对未来地震进行趋势性

预测。然而，正是对历史资料的分析，使他如闻警钟，寝食不安。1974年，他提出过一个“格架”观点，认为河北省的燕山构造带、涉县大名构造带和太行山前断裂带、沧东断裂带如同一个“11”形格架，该省地震有沿着这个框架由北而南、由南而北轮回发生的规律。《地球物理学报》1975年6月16日收到了由他执笔起草的《关于河北省地震危险性的探索》一文，他在文中提出：“一九八〇年前后在河北省北部有发生七级以上地震的可能。”

1976年4月6日内蒙和林格尔六点三级地震发生后，耿庆国和贾云年在灾区考察时相见。

“太迟了！”耿庆国对贾云年说：“你那个‘1980’太迟了。据我们的判断，大地震近期就会发生！”

“到底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今年下半年。京、津、唐、张地区。”

“咱们得扑下身子去抓短临前兆！”

5月22日晚，内蒙古自治区尤太忠书记设宴招待地震工作者。席间，贾云年来到耿庆国座前，提议：“为保

卫京、津、唐，为保卫毛主席，干杯！”

这对好友相约：和林格尔考察结束后，便奔赴唐山一带去摸情况。

这一切都像发生在昨天——如果日历真能翻回到几个月前该有多好！无法挽回，无法修改那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了。贾云年从1976年6月下旬起，就和河北省地震局地震地质组的同伴们一起在唐山地区奔波，从事野外地震地质调查。然而在他的视野里，并没有发现突出的临震前兆，如果他能及时注意发现临震前兆，他不会蒙难，那二十四万人说不定也不会蒙难。可是那场他曾预见过的大地震，在没有前震的情况下，于1976年7月28日突然降临了。它宣判了贾云年这半生事业的失败和他整个生命的终结！听扒挖尸体的人们说，贾云年在地震发生的刹那间，还很机敏地裹着棉被滚到了床下。但是房子整个儿塌了，他被闷死在其间。人们把一副完好的眼镜交给了他的妻子陈非比，还有一只表面完好的手表……只是由于地震时被强大的磁场损坏，它再也不会走动，它永远指着那个悲惨的时刻：3点42分。

在北京的防震棚里，耿庆国写下了一封悲壮的唁书：

非比同志：

您好！

惊悉贾云年同学遇难的噩耗，内心不胜悲痛！7月28日唐山、丰南七点八级强烈地震，给几十万人民造成了浩劫。作为地震工作者，我们内疚的心情是无以复加的。唐山地震临震预报没有做出，实在是我们毕生的遗憾！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给唐山、天津、北京人民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回想起来，痛感我们是有罪的，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贾云年同学和河北地震局、唐山地震队的十几位地震战士，不幸以身殉职，他们是第一批献身于地震的战士，值得我们永久的怀念！为云年同学的噩耗所带给我们地震事业和您本人的损失，向您——我们的老同学，谨致最衷心的慰问！唯望您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化悲痛为力量，振奋革命精神，努力完成云年同学未竟的事业——在二十四小时前预报出五级以上的地震，实

现大地震的临震预报和预防!!!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履行好我们当仁不让的神圣天职，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北京、保卫广大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奋不顾身地奋斗！向凶恶的自然界敌人——大地震，决一死战，为唐山大震遇难的阶级兄弟报仇，为云年同学报仇！

我想，我们只要拼命地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我们一定能够及时抓住下一次威胁北京安全的大地震，为人民立功赎罪！

如果下一次威胁北京安全的大地震没有抓住，使唐山的浩劫重演的话，我已下定了决心，要么像云年同学那样以身殉职，要么只好畏罪自杀，因为实在感到无地自容，惭愧万分！当然我并不悲观，我是感到有信心的。我是有决心，尽自己的全部努力，……

云年同学安息吧——我们会为唐山、丰南几十万遇难的阶级兄弟，也为云年同学和其他战友报仇雪恨的，誓与穷凶极恶的地震之敌血战到底!!!

望您节哀，振奋精神，勇往直前！

.....

耿庆国

1976年8月7日于北京

这分明是勇士准备再次搏斗的呐喊！

我不是一个地震工作者，我只是用我的心在感受这段历史。如今，十年过去了，那些拼搏过或者犹豫过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也许会被忽视，被遗忘。功与过，是与非，似乎也都不重要了。剩下的，依然是那个古老而永恒的课题。

然而，无论是被遗忘的，还是将要被遗忘的；无论是失败了的，还是有可能再次失败的，他们总是在拼尽全力地搏斗着。今天，这场搏斗也并没有因唐山的失败而结束，或许正是一个飞跃的开端。

拼搏着的，不仅是那一大批专业地震工作者，还有千千万万用土设备在监测地震的普通群众。唐山八中学生张仁英，在业余地震小组观察地应力变化，曾做出“七

月底八月初渤海北部有大地震”的预报；唐山二中老教师田金武，根据对地电、地磁的观测，提出“七月底八月初唐山有七级以上大震”。唐山马家沟矿地震办公室的马熙友，在震前也曾通过观察地电变化，预言唐山将有大地震。虽然他们的论据并不充分，但他们的责任感是不能被轻侮嘲弄的。他们和专业地震工作者一起在大震前发出过呐喊，发出过警告。

那些声音显得微弱的警告，也不是没有收效。

在国家地震局 1976 年 11 月 8 日发出的《地震工作简报》第十七期上，披露了一桩发人深思的事实。这期《地震工作简报》的标题为《青龙县在唐山大震前采取了预防措施》。简报称：

河北省青龙县紧靠唐山地区的迁安、卢龙两县，7 月 28 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七点八级强烈地震，由于县委重视，事先采取了有力的临震预防措施，广大群众有了思想准备，临震不乱，虽然房屋建筑遭到较重破坏，但人畜伤亡极小，收到了预防的效果。

今年七月中旬，青龙县地办的同志，参加国家地震

局在唐山召开的京、津、唐、渤、张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时，在会外了解到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等几个单位预报，7月22日至8月5日京、津、唐地区可能发生五级左右地震。7月21日会议结束回县，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进行了讨论，认为五级左右地震震级虽然不大，但根据国务院69号文件，京、津、唐、张近一两年内可能发生六级左右破坏性地震，考虑到青龙县处于京、津、唐、渤、张协作区范围内，因此决定，坚决贯彻我国地震工作方针，以预防为主，有备无患。7月24日，由县委书记冉广岐开电话会进行传达部署。当时县里正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区社书记和工作队长都在县里开会，决定25日每个公社回去一名书记，一名工作队负责人，具体抓好防震抗震工作；27日由县科委副主任在县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震情和防震抗震知识。25日，各公社、县直各单位都召开了紧急会议，公社干部包大队，大队干部包生产队，连夜向群众传达贯彻，进行防震抗震部署。县广播站向全县广播了防震抗震知识。多数公社广播站连续广播震情和地震知识，传达县委决定，基本上达到

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对重点工程、仓库、重要设施责成专人进行检查，县委书记、副书记还深入到八一水库进行检查，作具体部署。有的公社还集中基干民兵几百人巡逻值班。群众晚上不关门，不关窗户，以便有震情能迅速离开房屋。事实证明，群众有没有思想准备大不一样，唐山地震该县损坏房屋十八万多间，其中倒塌七千三百多间，但直接死于地震灾害的只有一人。震后五小时，青龙县派出了第一支医疗队奔赴灾区，在很短的时间内，组成抢救队，赴唐山救灾，抢运伤员。该县大丈子卫生院一个医生，27日出差到唐山市，住在他同学家里，因为听了县里传达这几天可能发生五级左右地震，他一面向同学讲明震情；一面睡觉时作了准备，把衣服、鞋放在一起。地震发生时他立即离开房屋，打开窗户，并叫出同学家里的人。虽然房屋倒塌，他自己未受伤，同学全家都跑出房屋，无一人受伤。

唐山大地震前夕，既然青龙县委在全县范围内采取了预防措施，也收到了极好的预防效果，那么，唐山大

地震到底能不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唐山市二十四万生灵的劫难到底能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避免？对于专业地震工作者来说，青龙县的“例外”反而更使人悔恨不已。他们不能不时常去想：如果在整个京、津、唐地区公开“吹”了“风”……

惨败。

历史将如何评价这场以惨败告终的搏斗？

历史将如何评价那些以惨败告终的搏斗者？

我的结束语

唐山无疑已属于人类。

1985年3月，我开始写作《唐山大地震》，至9月，就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发现我已与地震，而不仅仅是唐山，产生了无法解脱的感情维系。

3月4日至4月9日，智利圣地亚哥一带连续发生三次大于七级的地震。

5月和7月，两次七点一级地震又相继击中了新几内亚和巴基斯坦。

8月23日，一次七点四级地震，震撼了从中国新疆乌恰、疏附、喀什直到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大片区域。乌恰县百分之八十五的房屋夷为平地，数十人蒙难。这是唐山大地震和四川松潘、平武地震后，相对平静达九年之久的中国大陆的一个危险信号。

9月19日，墨西哥发生了震级与唐山大地震相同的七点八级强震，两天后又发生了六点八级强余震，首都墨西哥城——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满目疮夷，数万

人毙命……

墨西哥大地震发生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天天从晚间的电视节目中关注来自大洋彼岸的救灾新闻。那些倒塌的巨型建筑，那些在地震数天后仍然惊慌失措的市民，那些从废墟中被救出的伤员……无一不使我再次颤栗。无论是抢夺生命的救险队员，无论是在人群中费力穿行的救护车，还是为防止抢劫而在街头巡逻的警察，这一切情景都是我所熟悉的。从那个在电视摄像机前叙述地震情景的伤员身上，我又看到了我的“目击者”；而从那个在担架上疼得手臂抽搐着的墨西哥孩子的眼睛里，我分明又看到了人类对于自己、对于生命的呼唤。

地震！

给人类带来无穷灾难的地震！

全世界每年发生可记录的地震五百万次，其中有感地震五万次，造成破坏的近千次，而七级以上、足以造成惨重破坏的强震，每年平均要发生十余次！

更可怕的是，唐山的悲剧已警告人类：地震危险正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人口密度的

剧增——而成正比地不断升级。如果说，1923 年的东京大地震曾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巨大破坏，那么今天，一场发生在东京的破坏性地震将摧毁日本三分之一的经济力量；同样，在当今，如果美国的圣安德烈斯断层的活动再次引起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地震（就像许多学者的预言那样），那么，其损失也决不是八十年前的旧金山地震所能比拟的。

在写作《唐山大地震》的那些日子里，面对案头上的那架地球仪——这个神秘的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蔚蓝色球体，我会时常陷于一种悲观。

当人类对宇宙开发的兴趣日益浓厚，各种行星探测器频频飞向太空，甚至正在准备把机器人送上金星和火星工作、把第一批“月球居民”送上月球生活的时候，人们对属于自己的星球又认识得如何呢？人们怎样看待脚下的大地？人们探明了多少地底的奥秘？有人说，人类有两大难题：癌与地震。现在，据说癌症的被攻克已经指日可待，可是地震呢？人们对于包括地震在内的种种奇异而又可怖的自然现象，究竟有多少了解和防范

呢？

今天，人类的目光已经达到数百亿光年外的遥远天体，然而，人类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才“深入”了不过十二公里——苏联科拉半岛摩尔曼斯克附近的一眼达一万二千米的地质钻孔，被认为是世界之最。这就是现实。

当我和那些未能战胜恶魔的“失败的搏斗者”——那些饮恨唐山的地震预报科学家们促膝长谈的时候，心中常常翻腾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的情绪。他们那痛苦的眼神，沉重的叹息，常常把我引入一个悠远的广漠的世界，一个人与自然间征战不息的古战场。

多少年了？从唐山地震算起，才十年；从人类有文字的历史看，数千年；而要是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算起呢？

如果我们今天一代代人生存、繁衍的七大洲，是远古年代由一个“联合古陆”漂移或断裂而成，那么，就可以说，七大洲是在一系列强烈地震中诞生的！而我们的远祖也是在山摇地动中降世的！

因此，对于人类的祖先来说，地震和洪水、飓风同样地不可思议。人们用想象描绘那个主宰世界的精灵或是怪物：日本人说，地底下躺着一条巨大的鲰鱼，它翻一下身，便会地震；平时，一位神举着石槌监视着它，可是神偶有松懈，鲰鱼就会乘机翻身。古希腊人说，海神波塞冬是“大地的震撼者”，他愤怒时，“使海洋和大地同时震动”，悬岩为之颤抖，海岸也在他的三叉戟的突击下崩裂……

“烨烨震电，不令不宁；百川沸腾，山冢萃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中国人在《诗经》中留下了如此壮阔的地震景观。

“西奈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地震动……”《圣经》则这样记下了大自然奇异的突变。

人类认识地震，就像认识形形色色的大自然之谜一样，走过了数千年曲曲弯弯的道路，付出了并仍在付出无数血的代价。人类似乎在和大自然进行着一场无始无终的搏斗，从洪荒时代，一直延续到文明时代。为了生

存和繁衍，为了牢牢地站立于大地之上，人类没有一天不在锻造打开自然奥秘之门的钥匙。在地球飞速的旋转中，神话的迷雾渐渐消散了。可是，大自然依然以它神秘的存在，成为当今一个最大的司芬克斯之谜。

真是可悲的吗？

在我写作《唐山大地震》的日子里，有五个孩子始终陪伴着我。一个是照片上我心爱的儿子，另外四个，则在一组外国画片上。有时，我会觉得，当他们瞪着一双天真的眼睛看着我时，他们似乎比我更能理解大自然，理解我的写作，理解唐山的废墟。

无论是登上海城辉煌的顶峰，还是落入唐山黑暗的深渊，无论这中间有着多大的偶然性，中国的地震科学家们毕竟摸到过大自然的脉搏。尤其，当我因为采访和寻找数据，常常出入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震局办公大楼的时候，科学家们忙碌的身影，使我感受到了人类对于大自然的不屈不挠的求索精神、一种颇为深沉的人类固有的力度。

在云南，一个试验场正在紧张工作，科学家们正从

大量可记录的小震中探寻地震的规律。

在西北、华北，特殊记号标明的地震危险区域内，地震工作者们正枕戈待旦，警惕着中国大陆又一个地震高潮期的到来。

与此同时，国外的学者也在同步地为征服地震恶魔而努力工作。据塔斯社报道：苏联已决定在哈萨克首府阿拉木图附近的山前地带建立苏联第一座生物地震试验场。在那里，动物学家、生物物理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共同工作，目标是解决地震的临震预报问题。据《科学画报》报道：为寻找导致大陆漂移、火山爆发、地震频繁的地幔热流，美国科学家用分析地震冲击波速度的方法，绘制出第一批地球深处一千八百英里处的三维地图。还有一条与地震相距较远的消息也引起了我的注意，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报道，美籍科学家丁肇中教授正主持建造一个实验场，准备进行庞大试验——模拟“我们的宇宙”的初始状态，宇宙大爆炸的一刹那，以研究此刻地质结构变化和物质间的相互作用……这似乎更属于一种质的探索！

1985年6月9日，长期致力于地震预报研究的中国老科学家、石油部顾问翁文波，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震局发去一份电报，指出：8月20日，在巴楚北东东，将发生六点八级地震。

8月23日，巴楚以西三百公里的乌恰发生七点四级地震。

是继海城之后的又一次偶然吗？这或许算不上一条惊人的消息，可它却使我抑制不住地激动。十年了，唐山大地震以来，有多少人对地震预报失去了信心，有多少人在“人和自然”这一深奥而永恒的课题面前畏缩却步。事实却证明：希望之光并没有熄灭！

记得，在新疆乌恰发生地震的消息传来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北纬39.4度！又是一个40度线附近！我不止一次听地震工作者们说过，北纬40度线，是一条神秘诡谲有如百慕达三角的恐怖线。正是在北纬40度线以及邻近这一纬度的地位，发生过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大地震——

美国旧金山大地震；

葡萄牙里斯本大地震；
意大利波察坦以南地区地震；
日本十胜近海地震；
中国海城地震；
中国唐山地震；
.....

颇有戏剧性的是，我写作这本书时，双脚也正踩着这条“恐怖线”。北京，中国地震界设防的核心区域，也恰恰处在 40 度线上。

一个至今无人解释的谜。

不过，这仅是无数大地之谜中的一个。

在自然科学的浩瀚大海里，我们人类的哥伦布船队和麦哲伦船队才刚刚启航。从起点到终点是极其漫长的，但我们始终能看到那顶昂然前行的风帆。

我相信，人类终究会查明地幔热流和地震的关联，地核的不规则运动、地轴和磁轴的偏转和地震的关联，天文因素、太阳黑子和地震的关联，埃尔尼诺洋流和地震的关联，以及千千万万不可思议的自然现象、尚未把

握的物质运动规律和地震灾难的或远或近的关联……

我还相信，有一天，人类不仅将预报地震，还终将能“疏导”地震。究竟是像美国科普作家阿西莫夫所预言的，用沿断裂带打井注水的方法，诱发一些黏滑地震（小震），从而释放能量，避免大震（这似乎是一种奇想！），还是像我的一位朋友所预言的，将用小型地下核爆炸的方法，去达到同样的目的？也许还有许多更新更好的方法。不久的将来，那条躺卧在地底深处的大鲛鱼，也将会躺在人类设置的解剖台上，成为人类战胜自己、战胜大自然的一个象征。

也许，我的一位朋友的想法倒是可取的，人类对大自然的最后“征服”，不在于力的征服，而在于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和谐相处的前提不是人类的退避，而是以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为基础。总之，这一切，在今天，是幻想；可在明天，它一定会是现实。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目的。

我在为明天留取一个参照物，以证明人类毕竟是伟

大的。

为此，我为明天祝福。

我为人类祝福。

我为我们虽然有限却具有永恒意义的星球祝福。

1985 至 1986 年于北京

为纪念唐山地震十周年而作

1986 年 3 月 31 日校毕。是日，美国旧金山发生五点六级地震。

附录

纪念我的蒋叔叔

1995年8月，我正在南方采访，从唐山传来了蒋忆潮叔叔病逝的消息。蒋叔叔是“7.28”大地震发生时唐山市的民政局长，后来曾担任市文联主席。对他和他的夫人周桂兰阿姨，我怀有深深的感情。在地震后的“非常的八月”，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日子住在他们“家”——先是苇席棚，接着是帐篷，后来是越冬的“简易房”。他们关心爱护我如自己的孩子，而且，从那时起，蒋叔叔就已和我共同承担起了某种朦胧的“使命”：他乐此不疲地，引我去结识一个个在地震中有着各种经历的唐山人，让我作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参加“送孤之行”，还让我时常坐着他的那辆破旧的美式吉普车，在灾区奔波。地震后的近十年里，他更是不间断地帮我搜集资料，并帮助我，对唐山进行长时间的追踪采访，激励鞭策我留下一部历史的记录。

悲痛中，我想起了蒋叔叔的许多往事。

这是一个豁然对待命运的人。他是我父母的老朋友，从前在杭州工作。文革中被冲击，处境艰难，遂决定举家北迁，到夫人的老家唐山去工作。没想到，搬到唐山才两年，大地震就发生了。后来他自嘲说，他是“在劫难逃”：想躲避人祸，却没逃过天灾；但终究大难不死，成了“出土文物”！

在唐山废墟上，他意外地看到我时，不禁失声痛哭，——但这是我见过的他唯一的一次落泪。抹去泪水，他立刻恢复了我熟悉的乐观神态。他是一个富有鼓动性的老宣传干部，在朝鲜战场上是举着铁皮喇叭“瓦解敌军”的志愿军宣传站长。此时地震废墟成了他的阵地，他穿上了我从身上脱下给他的一套“的确凉”军装，每天手捂着胸部的伤处，为组织救灾而四下奔走，忙忙碌碌，生气勃勃。

命运打不倒我的蒋叔叔。住在蒋叔叔的“家”里，溽暑，苇席棚内热浪蒸腾，群蝇轰然；入秋，暴雨敲击着“简易房”那用砖头压住的油毛毡，如千军万马击鼓奋蹄。那些时候，我们海阔天空，谈论的话题从抗日战

争到抗美援朝，从浙江的文化大革命到“4.5 天安门事件”后的街谈巷议，从苏联歌曲（我从他家废墟中挖出一本《外国名歌 200 首》，珍藏至今）到小说诗歌，甚至十分认真地讨论旧体诗词的格律。我还饶有兴致地在笔记本里记下他告诉我的各种各样的唐山老百姓的“群众语言”。

人生有种种“横祸”，四周有各样丑恶和不平，但蒋叔叔很少压抑，很少叹息。他生性随和，喜爱交往，他的眼睛，常常看到善良和美好的事物。有一次我们走在路上，他突然让我仔细瞧瞧路边一位神情安详，正在用新锅新铲烙饼的大娘。“……她的锅是上海的，她的铲是辽宁的，她的面是山东的，她的油是山西的……”当蒋叔叔沉浸在他的想象中的时候，我也被那幅特有的灾区风俗画所打动了。望着袅袅炊烟，嗅着烙饼的焦香，我们就像欣赏世上一道最美的风景，在苍茫暮色中伫立良久。

我印象最深的事，是蒋叔叔喝茶。

蒋叔叔在杭州工作多年，养成了品茶的嗜好。地震

后的几天，家人在原住址的废墟上挖掘。周桂兰阿姨要挖存折和日用物品，蒋叔叔急于寻找的却是他的瓷杯和茶叶。终于，砸豁了口的薄胎瓷杯和混进了沙土的“龙井”茶叶被小心翼翼地发掘出来。这是蒋叔叔最过瘾的时刻，他把烧印着他姓名的“专用茶杯”（震前唐山人有在瓷杯上烧印姓名的时尚）擦了又擦，便让阿姨煮水沏茶。可是水在哪里？那时，北京天津的消防车还没有开始向唐山送水，水，是唐山人的珍稀之物。

蒋叔叔却不慌不忙。“那里——”他指着他家原址小院的一小块平地，“挖挖看，说不定会有水的。”原来，那是他平日里习惯地倒剩茶、甚至泼洗脸水的地方。

没出他所料，没挖多深，就有“泉水”在孩子们的欢呼声中源源渗出。

这故事，是我到唐山灾区后听人绘声绘色讲述的，或许不无夸张，但我相信那故事准确勾勒了蒋叔叔的性格。没错，他就是这样的性情中人。

这是大灾难中的人。从他们身上足可探究中国人的生命遗传密码。的确，唐山的故事，不只是鲜血和眼泪。

十年前，我为灾难中的惨烈悲壮和人们对灾难的殊死抗争而震撼而动情，十年后，我开始更多地体味出，人类面对灾难时那种“平常心态”的深远意蕴。

在今天，重读《唐山大地震》中灾难亲历者们的自述，最震撼我自己的，竟是唐山人在灾难中的那些最普通、普通得近于琐屑生活细节：废墟中生存了八天七夜的王子兰，她在黑暗中最揪心的一件事，是怕她的那块“东风”牌手表生锈停走，这是她参加工作后买的第一件心爱的东西，于是，她不停地给手表上弦，手表那滴滴答答的响声，给了绝境中的她极大的安慰……“大大超越生命极限的人”——卢桂兰大妈，她在“地狱”中十三天里，有一段时间“迷迷瞪瞪地”完全沉浸在家事之中，想着没给患病的老伴送终，想着小闺女的安危，甚至愤愤地想着和邻居那个“婆娘”的你长我短……在矿井下坚持了十五天的“最后的五个男子汉”，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们“情绪麻木地聊天”，谈的是“在家吃过的最好的东西”，谈的是“每个月的工资怎样开销，怎样孝敬老人”……

我在唐山看到过另一些废墟中蒙难者的遗体，我在书中写道：他们显然不是死于砸伤或挤压伤，完整的身体上，留下了一道道疯狂抓挠的指印……

是的，易于被灾难击倒的，恰恰是心灵胶着于灾难的人——无论他的“外壳”是羸弱还是刚强。灾难和厄运的力量之所以往往“强大”，是因为它能慑服人的精神，把人类网入它的逻辑。它能假人类之手，让人类自囚，自刑，甚至自我毁灭。

我们来到世界上，必须接受这个星球的喜怒无常。命运会把人抛到这样那样的“废墟”之上，人类注定要永远与厄运抗争。但人类的精神可以超越厄运。不要悲叹每个人在突降的劫难面前都如狂风前的小草，小草比大树更难被摧毁。不被命运所厄的首要前提，是摆脱“灾氛”，不让自我引爆的恐惧和窒息感堵断生命的源泉。这就是为什么蒋叔叔和千千万万“唐山人”的“平常心”如此坚韧。“平常心”，至柔至刚，它意味着恒定的生命节奏，它是大从容和大自由。

我到过唐山，我有我的爽朗达观的蒋叔叔，这将影

响我的一生。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逆境，我都会看到蒋忆潮叔叔在废墟上面对那汪“泉水”时的惬意，听到他那有滋有味的苏北腔——

“沏茶！”

写于 1996 年

1996 年修订版序

在 1996 年修订版出版之前，本书在香港已印行了八版。拥有越来越多的知音，是作者的荣幸。特别当我得知，我的热心读者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校学生，我更为之感动。

让我把修订版的这篇序言，首先赠给这些朋友。

不久前，有近百名专业各异的作者，包括自然科学家、作家、记者，考证和记录了自 1900 年以来在中国发生的一百个最大的自然灾害。由我和耿庆国教授主编了一部《20 世纪中国重灾百录》的书，是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国际减灾十年”这项全球活动的志愿参与。

我在那本书的序言中写道：

中国多灾。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是自然界充满动荡、充满异象的舞台。它由西向东，呈三级巨大的台阶。这里有世界最高的山脉，也有世界著名的低谷。它三面为高原所屏障，一面濒临大海，纵贯寒带、

温带和热带。大陆区地势的剧烈起伏，大气环流极地高压与副热带高压的消长，季风的影响，海温的巨变，还有地球超长时段冷暖变化对它的制约，使中国的气象灾害与海洋灾害频繁发生。中国大陆处于强烈宏大的环太平洋地震带与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交汇部位，现代地壳活动剧烈，又使得中国地震与地质灾害突出严重。

唐山大地震正是在这样的时空框架中发生的。它是 20 世纪迄今为止全球人员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次地震灾害。一代代中国人，以至全人类，都应当对那 24 万惨死的生灵铭记永远。

《唐山大地震》是作者在灾难现场的目击实录，这是它始终受到读者重视的原因。自 1986 年以来，它的日文版、英文版先后出版，它在美国的一些大学被列为教学参考书，它的部分章节收入了香港中学的中国语文教材。

我希望唐山大地震的“惨史”永远不被湮没和淡忘。我更希望有一天，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能通过一项议案，在每年“7□28”的清晨，中国各地同时敲响钟声，

对在唐山大地震和一切自然灾害中死难的同胞表示哀悼，对华夏大地和整个地球的平安表示祈盼。

20 世纪的人类对于战争带来的惨剧怀有深刻的记忆和高度的警觉，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纪念日，缅怀战争的死者，祈祷人类的和平。

相形之下，人类对自然灾害的高度警觉和理性的整体防御，还刚刚开始。

1987 年，第 42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169 号决议，决定把从 1990 年开始的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定名为“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1989 年，第 44 届联大又通过《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决议案》及《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国际行动纲领》。

Disaster Reduction——“减灾”，是跨世纪一代人的使命。

21 世纪人应当比他们的前辈享受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和谐，更多的宁静。他们将更智慧而不是更蒙昧，更自然而不是更异化，更温和宽容而不是更会自相残杀，对自己的母亲地球，将有更多的孝子之心而不是更会索

取和摧残。

这是我在《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中表达的祈愿。

也正是为了这样的祈愿，在即将步入21世纪之时，我把《唐山大地震》1996年修订版奉献给读者。

1996，我的唐山

——1996年修订版后记

我们不能不为光阴的飞逝而慨然。唐山地震的景象恍如昨天，可是转眼之间，它分明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

1995年12月21日，媒体报道，唐山市福利院一位名叫王安的青年人，来到唐山市工人医院，当上了电梯工。报纸说，这是最后一名参加工作的唐山地震孤儿，至此，“地震孤儿”们已经全部走上了工作岗位。

这短短的消息令我感动。王安，我想象着那个1976

年的小王安。我像是看见，那个满身划痕的小小的婴儿，啼哭着，被人从钢筋和水泥预制板的缝隙中小心翼翼地艰难地救护出来。我想象不出，大概是地震孤儿中最小一个的王安，今天已经长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男子汉。

这就是“二十年”。

一代“废墟上的孩子”长大成人了。唐山地震的孤儿们，有的成了工人，有的成了工程师，有的成了留洋的博士，有的被外国友人收养，接到了异国他乡；更多的是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仅唐山育红学校的七百多孩子中，就有四百多人成了军人。

唐山地震造成了二十四万多人死亡。在唐山市区，有七千多个家庭因全家震亡而绝户；有七千多个丈夫失去了妻子，有八千多个妻子失去了丈夫。然而，在大地震发生的二十年之后，唐山市区的人口比地震前增加了约百分之五十，达到了一百五十六万多人。整个唐山市范围内人口达到六百七十五万多人。

我在本书中说过，人类的生命力是顽强的。

唐山地震后的二十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从计划

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二十年。在深刻的变革中，唐山，这个国营大中型企业密集的传统工业重镇，正奋力追赶大潮——当然，在“废墟”上前行的步履并不轻松。

地震前唐山的支柱性产业陶瓷业风华依然，全国陶瓷企业在外贸方面的“状元”和“探花”都在唐山。但是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在国家经济格局不断变化的今天，已不占有地震前那样的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唐山的变化依然令世人瞩目。

唐山经济在地震后渡过恢复期，开始了稳步的发展。到1995年，辖十个县、五个区、两个农场的唐山市，国民生产总值为四百八十五亿元人民币，人均产值七千一百五十元。

地震曾把唐山夷为平地。1985年我在唐山采访时，简易房还比比皆是。而现在，唐山市新楼林立，环境美观的居民小区随处可见。到1994年底，唐山市区的住宅建筑面积已达到了一千七百五十六点六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七点九平方米，这一居住水平和唐山市住宅的“供热”和“供（煤）气”水平，在中国大陆的大中城

市都居较高水平。联合国曾授予唐山市“人居荣誉奖”，唐山是中国第一个获此荣誉的城市。

唐山也有了摩天大楼。高度为一百一十二米的凤凰大厦，别有深意地选择了在1996年7月地震二十周年之际完工。

唐山市努力扩大自己在今天的知名度。它先后承办了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第二届全国城市运动会和中、日、韩三国青少年运动会。在中国，作为一个非直辖市、非省会城市，这样的业绩是令人钦羡的。

“大地震”，似乎真的“远去”了。

《唐山大地震》自出版至今，已经十年。我当年采访过、在本书中描写过的一些主要人物，他们的生活境况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

当年开着红色救护车到北京中南海报警的李玉林，已从唐山矿退休。

那位曾在废墟上弹着三弦、引吭高歌的盲人资希圣也已退休。他退休后担任了一个居民委员会的主任，忙着为居民们服务，最经常的工作是“调解邻里纠纷”。

“张家五姐弟”，四个姐姐都已成了妈妈，可漂亮的小弟至今还没有定下对象。姐姐们“抱怨”说：“嗨，他呀，挑花了眼！”

从矿井下坚持十五天才获救的“最后的五个男子汉”，老班长在我采访时就已去世，其余四位，有三位的工作岗位从“井下”调到了“井上”，而小个子李宝兴还在井下采掘。

“大大超越生命极限的人”——卢桂兰大妈，在一九九六年春天病故了，据说是因为心血管系统的疾病，终年六十六岁。她的去世使我非常悲痛。一九九二年，她应邀来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拍摄。在《正大综艺》的拍摄现场，大妈接受赵忠祥和杨澜的采访，滔滔不绝地回忆当年在地下十三天的经历。她依然是那么坚强乐观——“我当时就没害怕！我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唱‘东方红，太阳升……’我相信，亲人解放军一定会把我救出来！”她把记忆中当年救她的战士和当年在现场采访她的我混淆起来，竟对着摄像机大声说：“是三十八军的钱钢救了我！”她亲切质朴的形象感

染了所有的现场来宾，感染了主持人、编导和机房里的工作人员，现场激起一阵阵笑声和掌声，向这位可爱的大妈表示由衷的敬意。

唐山大地震的历史，刻在一代中国人心里，是永远抹不去的。

国家地震局的“老红军局长”刘英勇，在退休后，于1990年1月8日因患癌症而病故。那年他七十五岁。

地震预报工作者们还在继续拼搏、奋斗。

唐山地震的预测、预报、预防问题，在近十年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海内外科学家的研究兴趣。唐山地震发生前，中央政府最终没有得到来自国家地震局方面提供的短期临震预报意见，以致唐山市最终没有预防。然而，距唐山市仅一百十五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在全县范围内采取了预防措施，地震中伤亡极少。1996年，青龙县被联合国发展、资助和管理事务部列为“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取得成效的”典型，该部的报告称：“要减轻灾害的损失，早期预报和动员群众作好准备是关键的一环。由于早期预报通常是科学家做出的，加强科学家和

行政管理人员的联系尤其重要。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只有高效的行政管理才能有条不紊地采取对策和组织群众。”青龙县的防震抗震经验已被输入国际互联网。到联合国介绍青龙县经验的正是本书描写过的汪成民。

当年的地震预报工作者汪成民，现在是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第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地震地下水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当年的地震预报工作者耿庆国，现在是中国地震气象学、“天地生”综合研究和天灾综合预报的学术带头人，研究员。他和汪成民都在继续从事地震预报工作，他同时还是《中国减灾报》的副总编辑。

在写作《唐山大地震》时，我是《解放军报》记者。1990年，我转业离开军队。变化着的境遇，使我“始料未及”地来到了国家地震局。我和地震真的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来到当时的《中国地震报》社，而我的直接领导，就是耿庆国。这是命运的安排。

我们共同投入了“减灾”事业：1991年，我们共同参与创办了《中国减灾报》。1993年，我们共同主编了

百万字的专著《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

1996年，耿庆国五十五岁，他依然还存着孩童般的纯真乃至天真。这是一个专注于事业的心底透明的科学家，刚正率直，不迎世好，和他一起工作，是我的幸运。

作为记者和作家，我将继续我在二十年前就抱定的事业——这个事业是唐山大地震所赋予我的。我将继续奔波，继续写作，用作品回报读者。

《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序（*注：写于1992年，该书由钱钢和耿庆国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还没有人这样写过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近百名专业各异的执笔者，包括自然科学家、作家、记者，本色地记录了自1900年以来在中国发生的100个最大的自然灾害。

中国“多灾”。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是自然界充满动荡、充满异象的舞台。它由西向东，呈三级巨大的台阶。这里有世界最高的山峰，也有世界著名

的低谷。它三面为高原所屏障，一面濒临大海，纵贯寒带、温带和热带。大陆区地势的剧烈起伏，大气环流极地高压与副热带高压的消长，季风的影响，海温的巨变，还有地球超长时段冷暖变化对它的制约(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的气温经历了1840——1919冷、1920——1949暖、1949——1979冷、1980年之后暖的两度冷暖变化)，这一切使中国的气象灾害与海洋灾害频繁发生。中国大陆处于强烈宏大的环太平洋地震带与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交汇部位，现代地壳活动剧烈，又使得中国地震与地质灾害突出严重。

在人类的能力大幅度增强、物质欲望空前膨胀的20世纪，人类活动正日益成为全球自然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正如一些学者所说，中纬度地带的气候暖干化、滨海三角洲及平原的沉降与海面上升，森林过伐与不适当的土地利用对地表过程的不良影响，大规模水资源开发及水污染等，不仅具有全球性，而且在20世纪中国区域显得特别严重。20世纪，中国的人口从4亿激增至12亿以上。同步增长的，是旱灾、水灾、海岸侵蚀、风暴

潮、盐水入侵、土壤侵蚀、风沙活动与沙漠化、土地退化、冻土融化、冰川湖溃决、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频率。

在这本书中，20 世纪初震撼世界的“庚子之变”，与政治、宗教、外交的纷争，与义和团、八国联军并存的是“1900 年华北大旱”。清王朝行将崩溃前的历史，被生动记录的不是“立宪”的难产、“革命”的胎动，而是震惊了世界的“1910 年哈尔滨大鼠疫”。在本书中展示的“抗日战争”时期社会画卷，突现的是“1939 年天津大水”、“1942 年河南大旱”、“1943 年广东大旱”。而“文化大革命”10 年，在这里留下了“1969 年渤海湾冰封”、“1969 年汕头台风”、“1972 年华北大旱”、“1975 年驻马店大水”、“1976 年唐山地震”（及 1966-1976 年 10 年强震活跃期）……等一个又一个自然与“人祸”叠加的灾难。

这里表达了一种观念：

历史是多元的；它不仅是一代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眼中的历史，同时，具有更多的侧面、更为复杂纷繁的

内涵。这部“灾难史”是一个尝试；它试图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不仅仅是一块主权意义上的“领土”，更不仅仅是一个种族意义上的“民族”；中国，首先是地球北半部一个有着山川、河流、草原、荒漠、海岸、岛屿的广袤的自然区域。

在地球——太阳系的 51 亿年历史面前，人类的全部演化史仅是白驹过隙的一瞬，在地球——宇宙巨不可测的能量与质量面前，人类轻若纤埃。人类是在自然界变化的框架之内，一幕幕上演着他们的争斗。地球巨大的变动，至深且巨地制约着影响着人类的种种悲喜剧。自然变化的历史，和它所影响下的人类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融合一体，构成了真正的“大历史”。

无疑，这比我们人类以往能够解读的历史更为真实。

在这里，对自然界冲突变故的描述明了直接；人类在自然灾害中的遭遇，不再是政治史脚注——有时被当做“政治法庭”随意传讯的“证人”，以证明某优某劣；有时又蓄意杜撰出、夸张出它的存在，以推卸逃避人类自己对同类犯下的罪孽。

1987年，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69号决议，决定把从1990年开始的20世纪的最后十年定名为“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1989年，第44届联大又通过《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决议案》及《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国际行动纲领》。本书是一批中国科学家、作家、记者对这项全球活动的志愿参与。

为了远离灾难，他们走近灾难，留下了20世纪中国人与地球相守相伴又相煎相残的百年长卷。他们将它传递给生存在第21个世纪的人类。

21世纪人，应当比他们的前辈享受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和谐，更多的宁静。他们将更智慧而不是更蒙昧，更自然而不是更“异化”，更温和宽容而不是更会自相残杀，对自己的母亲地球，将有更多的孝子之心而不是更会索取和摧残。——但，大自然有着远比人类更宏阔的生命节律；21世纪决不可能是无灾的世纪。

Disaster Reduction ——是的，“减灾”。不是如20世纪中国人高喊“人定胜天”时幻想的“灭灾”，也不仅仅是一次又一次虚弱无力的“救灾”。新世纪的人类，

是否将在 20 世纪百年膨胀后转向静敛，把更多的力量和智慧投入自身与自然界的融合，在珍惜自然的同时珍惜自身，像爱护自身一样爱护自然？

本书是 20 世纪中国为 21 世纪世界留下的历史备忘录。

近百名专业各异的执笔者在这里共同祝福地球与人类的明天。

从唐山大地震到 “非典” 疫潮 ——2003 年 9 月 21 日在香港中央图书馆的演讲

先向在座的朋友说一声谢谢，特别要向现在还站在门外大厅的朋友说谢谢。辛苦你们了！

我们一起经历了 SARS，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我 3 月 5 号来到香港，整个 SARS 的高潮中间，我一直是在香港大学。如果有人问我，你自己印象最深的是

甚么？让我告诉大家：

第一个印象是一首歌，我想在座的各位或许还能记得，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台在播送新闻时，常常出现一段过渡的音乐，这个音乐就是“*We Shall Overcome*”，我想你们一定记得，而且一定会唱这首美国歌。“我们要征服”，征服 SARS，这是我第一个强烈印象。

我的第二个印象，也是一首歌。香港人给为了抢救病人而献身的谢婉雯医生送行的时候，成百上千的人在浩园唱起一首歌。我当时误以为是一首基督教的歌，后来越听觉得越耳熟，终于听出来，它是中国的古典名曲《*阳关三叠*》。在香港，我听见“*We Shall Overcome*”，也听到《*阳关三叠*》。香港的中西合璧，令我感慨。

第三个印象，还是一首歌。大家知道 SARS 期间我们每天都要用消毒剂洗很多次手。有一个同学跟我讲：钱老师，你知道吗？洗手的时候你一定要唱歌的，唱甚么歌呢？唱“*Happy Birthday to You*”。她说：你一定要从第一句唱到最后一句，你把这首歌唱完，手就已经彻底消毒了。噢，原来香港的同学用这首《*生日快乐*》，让

消毒的过程尽善尽美，在面临生死的严峻时刻，香港人还有这样的生活态度！

今天我想谈谈我个人和《唐山大地震》这本书。

很多人问我，当时唐山有很多人在现场，有作家，也有记者，为甚么写唐山大地震的使命会落到你的身上？确实，我有特别的机会。

唐山地震发生不久，我就去参加救灾。我去时，口袋里面装满了纸条。很多很多的人，听说我要去，把想要寻找的人写在纸条上叫我去找。你知道那时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提电话，唐山完全是消息隔绝的。口袋的纸条中包括我妈妈写的。我家在杭州，妈妈托人打电话给我说，一定要去找你的蒋叔叔。蒋叔叔是我妈妈的老朋友。大家不知道能否理解，在当时的文化大革命中，很多的人都被抓起来、关起来。蒋叔叔在杭州很倒霉，被斗争，日子很苦，然后他就跟他的夫人——他的夫人是唐山人，他们在1975年的时候做了个决定，说，唉呀，杭州这个地方真不是个好过的地方，我们走吧，回唐山去。没想到逃避了杭州的斗争，又遇到唐山的地震。他

们是死是活？他们家还有两个孩子，比我小，是我们的弟弟妹妹，他们怎么样？

一些熟人在条子上写了人名，托我帮他们在唐山找人，我就拿着一叠条子到了唐山。除了随身衣服，我带了一些大蒜，还带了黄连素，因为都说唐山特别危险，有传染病，所以要带药。还有一瓶糖——那时候内地的生活非常苦，买糖都要凭票。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一瓶椰子糖。因为有人说到唐山后你没有饭吃的，我想没有饭吃的时候我就吃一颗糖，也许能坚持。

可是哪里能够去找甚么蒋叔叔、张叔叔？地震后的唐山已经没有门牌号码、没有路了，只有废墟。一个人一生中如果见过唐山废墟，你就知道，甚么叫巨大的灾变、人类的噩运。

说来凑巧，那天我跟防疫队去了几个医疗队以后，正在跟人谈事，突然听到一个声音特别耳熟，是苏北口音，那不是我的那个蒋叔叔吗？没有那么凑巧的，到了唐山才一天，我就意外地遇到蒋叔叔，我一下子就叫起来了，蒋叔叔见到我一下子就跑上来，他的表情是我一

辈子不能忘记的，又是笑又是哭，然后，他语不成句，就到处指：你看你看，我们唐山都怎么怎么……我们俩一下子就紧紧地抱在一起。那时候我做的第一个反应是，马上脱下我的军装给蒋叔叔穿上。

蒋叔叔是唐山市的民政局局长，“民政局”管理社会的救济事务，比如说残障人。因为有蒋叔叔，所以我一边参加救灾，一边参加蒋叔叔的一些工作。他跟我讲：钱钢，你是喜欢文学的，你要多了解唐山的情况，我来帮你。他是一个局长，有一部汽车，甚么汽车呢？又破又小的美国吉普，是战争年代留下来的破汽车。他有一个司机，他就让司机载我到处去走、让我去了解情况，让我去了解那些盲人、聋哑人，他们怎样度过地震以后的日子，特别是让我跟他一起去送唐山孤儿。

很多人问，唐山地震是 1976 年发生的，为甚么你的书是 1986 年才出版呢？问题就在这里。在 1976 年，我在唐山经历了许多事情，但是没有要出一本书的计划，也不可能。

在唐山地震时，地震的消息、地震中间的人民伤亡，

是秘密。地震的时候在现场，如果有人带一部照相机，那么你就立刻会被警员抓起来，相机会被没收。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地震的照片，它不是由当时的记者拍的，是科学工作者在日后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类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坏”，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的。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找到了一幅起重机从废墟里把死者搬出来的模模糊糊的照片。不知道是谁秘密地拍下来的，在当时那是犯法的。

当时我写过一些诗，其中一首叫作《烙饼的大娘》。在走过唐山路边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婆婆，在那里烙饼，我心里就想，好，我要写一首诗，写甚么呢？写这个大娘啊：她烙饼的面粉是从山西省送来的，她的油是从山东省送来的，她的锅子是从江苏省送来的，她的铲子是从浙江省送来的。我的意思是甚么呢？你看，从大娘的这个锅子里面，你看到了全国人民的“阶级友爱”。这个想法固然也不错，但是，当年像我们这样的作者，一考虑问题，就会习惯地想，噢，我要写一个东西，怎样去

歌颂我们的国家，怎么去歌颂我们的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想法，除此而外，没有更多。

所以说，最初的时候，不要说别人不允许你写，你自己也没有想过去写后来这本《唐山大地震》。

从唐山地震往后三年、五年、八年，你们知道在中国是变化最大的一个年代，我们叫甚么呢？今天叫作“改革开放”。它到来对我来说意味甚么？对我来说，就是思维习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84年，唐山地震快要十年了，一本杂志向我约稿，题目是“一座城市的毁灭和新生”。他们是说，你看从前是一片废墟，今天这个城市又重新建设起来了，盖了许多新房子，在盖新房子的时候，有一个建筑公司表现得很好，它采取了一些改革的措施，发了奖金等等、等等。杂志要我写唐山在十年里边的变化，它的立足点，还是在要歌颂谁谁谁的功劳。

但是，这个时候是1984年，我的内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问自己，我为甚么只能用灾难来衬托十年以后的成就，而不能直接去写当时唐山人所受过的苦难呢？

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叫“文学是人学”，但是如果不是

到了 80 年代，我们不可能真正去写人的苦难、人的命运、人的悲欢离合、人的柔弱、人的坚强。

我们不会忘记亲身经历的东​​西。我们曾经过着贫乏的物质生活，没有人的尊严，不知道怎样去尊重人、怎么去爱人，在文学作品里边，你看不到人和人之间的爱。终于，经过思想解放运动，我们明白了，“人”是第一位的，我们要文学去反映“人”。这好像是一把钥匙，到我拿到这把钥匙的时候，我在唐山的日日夜夜，许多难忘的东西，跟泉水一样喷发出来。

我在那里不光是一个每天背药桶去喷药的防疫队员，也不光是一个四处采访的作者。因为蒋叔叔的孩子已经受伤送到了外地，我就到他们家里，成为他们的“儿子”，跟他们一起经历过所有的生活。先是住芦席的篷子，天气凉了，我们用解放军的帐篷做起了新家；天气更冷了，我们用砖头临时赶建起过冬的简易房。没有水，在街上消防车每天来，一家人发一桶水，要排队的，甚至有时候要抢。没有衣服，有时发救济衣，可能一家人领一件衣服，可能大小还不合适。有的时候，没有米，没

有面，就上街去领。这就是灾民的生活。

唐山的灾难，影响非常深远。一直到今天，它的后遗症还存在。很多人记得的唐山，远远不止于我所看到的唐山。不久以前，我看到一个浙江的官员，他说，噢，你是写唐山的，我一看到你就想起一件事。他从前是军人，在中越边境的老山打过仗，当时是个连长。他说，在老山的时候，上面分配来一个年轻的军官。老山那地方当时到处是地雷，非常危险。新分来的这个军官，就一步不离地跟着他，他对新军官说，你干甚么总跟着我？新军官说，连长啊，我要跟你说句话，我是唐山人，我家就剩了我一个了，地震的时候，他们全死了……我有点怕。一天，这个连长带着他，通过一段非常危险的地方，突然，就听他叫了一声，回头一看，人没有了。出了甚么事情？原来路很滑，他一下子滑到了山坡底下去了。就听到山坡底下，“轰，轰，轰”，一连串的地雷爆炸了……。原来这也是一个唐山地震的孤儿！

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新闻，有责任去把人类的痛苦如实地记录下来。我从事过中国自然灾害史的研究，在

一些科学家和作家、记者朋友的共同帮助下，我参与主编了一部叫作《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的书，我们的口号是：“为了远离灾难，我们走近灾难。”我们要把1900年一直到1999年，一百年间中国发生的灾害，一个一个搞清楚。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离铜锣湾很近，大家知道铜锣湾那片海就是避风塘。大家试想一下，如果在香港发生一次有成千上万人遇难的自然灾害是甚么景象。这就是在1906年9月18号的台风。香港早在1882年已经开始挂风球报告台风消息了，但是偏偏1906年的台风毫无迹象，甚么迹象都没有，一个外国神父还驾船，在青衣一带传道呢！突然台风到来，造成极大的伤亡，当时铜锣湾的船都打成了碎片，铜锣湾避风塘全飘满了碎船的木板，人可以在避风塘里的碎船板上走来走去，灾情如此惨重，一万人伤亡。

除了唐山大地震，中国还发生过很多伤亡惨重的灾害。在唐山大地震仅仅一年之前，还发生了1975年可以称之为世界最大的水库垮坝惨案。由于淮河大水，两个

特大水库、十几个中型水库、一百个小型水库同时溃决，河南驻马店地区完全是一片汪洋，有一个县全部沉没在水底，京广铁路停车一百多天，巨大的火车车厢都被冲到几十公里之外。

20 世纪在中国还发生过多类似 SARS 这样的疫潮，比如说 1910 年，清朝末年，发生了东北特大鼠疫。那次鼠疫跟这次 SARS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首先动物传给人类，第二是飞沫传染疾病，第三是肺科的疾病，第四是沿交通线迅速地扩散，第五造成严重的地区性恐慌，第六是跨国界的，俄罗斯和中国都发生问题，第七是政府采取了隔离措施。很多事情非常的相似。最后全世界在中国召开了万国鼠疫大会，不简单的。

大家知道，1988 年上海发生了“甲肝”——甲型肝炎，这个“甲肝”，跟这次的 SARS 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它在时间上非常相似，元旦开始出现，春节形成高潮，春天爆发，然后又突然消失。当然，有一点不同：肝炎是人类有认识的，有疫苗可以防范。但是 1988 年的这么一场肝炎，发病的高峰每天有一万个病例新增，上

海的医院根本没有充足的病床可以供病人住院。这次“甲肝”总共导致四十万人染病，引致四十多人死亡，肝炎啊，直接死亡四十多人。大家再想一想，在物质贫困时代，中国人，得肝炎是得起不起的，丧失劳动力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你要在报纸上去寻找它的数据，你会找不到，轻描淡写，没有多少。

我们来说一说这次的 SARS。荧幕上是我的朋友——《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贺延光，在 SARS 中间拍的一幅照片。贺延光拍了几千幅有关 SARS 的照片。谈到中国对于 SARS 的报道，贺延光说，灾害就是灾害，死亡就是死亡，为甚么我们的报道里，你看不到这种死亡的真相？这样贺延光就拍下了这张照片：一个病人刚刚死去，旁边是一个无奈的医生。

大家知道 4 月 20 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下台了。下台了以后，在北京的报纸上，前一时期的寂静无声，变成了震耳欲聋的“非典”的报导。4 月 23 日这一天，《中国青年报》的头版，在“非典时期的怕和爱”专栏登了一篇文章，是一个北大学生她的来信。

我把这个来信给大家念一遍，它的题目叫《请为我的父母祈祷》。这个大学生的文章说：

4月21日晚，父母把我叫回了家，吃饭时他们告诉我，他们所在的医院，已经被北京市卫生局指定为SARS专门接收医院了，一个星期之内将清空所有的病人，集中所有的医护人员，专门救治“非典”病人。他们叫我回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并让我带够衣服和钱，叫我以后不要回家了，他们也会被封闭在医院，不能出来，甚么时候能出来，也是未知数。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晴空霹雳一般，当时不知说甚么好，半天说出一句：你们会不会感染上？可是谁都知道，赶上这事的医生的感染率是相当高的。我想让他们辞职不干了，我说，以后我上班养活你们！父母只是笑笑，说我孩子气。由于他们都在一个医院工作，所以可以享受只去一个人到医院的待遇。（就是她父母同在一家医院，就可以一个人去SARS病区，一个人不去。）当我要求他们只去一个人时，他们几乎同时说：“我去！”父亲说，他是一家之主，有责任承担这个危险；而母亲说，如果只有一个人去的话，

那就是她去。他们就在饭桌上就这么平静地争着，而我的心就像被刺破了一样，我不相信我的家有一天会要面临这种生死抉择。他们让我决定谁去，我快要哭出来了，感到极度的无助和伤心，我喊着：“无论你们谁染上，咱们这个家就算要完了！你们谁也不许去！”最后母亲慈祥地看着我，说了一句我一想起来就要流眼泪的话：“你以后会有你自己的家庭的，你已经长大了。”母亲说这句话时那慈祥平和但又不容置疑的口气，让我心碎欲裂：“我和你爸爸这么多年的夫妻了，谁去都不放心，就像你现在不放心我们一样。所以叫你回来之前，我们已经决定了，两个人都去。比起那些孩子还小的同事，我们感到幸运多了。”此时我的叫喊、我的眼泪已经无济于事，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绝望，我又一次求他们放弃这个工作，不要去，我现在打工挣的钱三个人够用了。父亲说，他做了三十多年的医生，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时候，决不能愧对“医生”这个称号，这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坐在那里傻傻地发呆。电话响起来，是父亲医学院的同学听说了这个消息，打电话来问候。父

亲还在电话中说，要是他“光荣”了（内地的话就是说如果他遇难了），就是他们这个班第一个为医疗事业献身的人。母亲安静地给我收拾东西，我本来每周都回家，但这次，他们给我带够了换洗的衣服，我只能这样回学校了。一想到我不知甚么时候才能回家，才能见到我的父母，我就泪如泉涌。街上形形色色的行人，有的跟父母一起出来，去超市购物。我想我的家本来也同他们是一样的，我的父母下班后也会去超市，去菜市场讨价还价，他们本来不是甚么崇高的伟人，他们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只是这个时候他们忠于自己的职责而已。我多年来养成的玩世不恭、叛逆不羁，在瞬间土崩瓦解。我多想再听我妈妈的唠叨，而不是从今天起为他们担惊受怕，有家不能回。我现在真的不知怎么办才好，回到实验室坐在计算机前发呆，每到吃饭时就忍不住流眼泪。我亲爱的朋友，请为我的父母祈祷，祝他们平安好吗？这也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谢谢你们，祝你们和你们的父母都健康。

从唐山地震，到这次 SARS，我想说，“人”这个字，

终于在我们面前树立起来了。尽管我们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尽管 SARS 的消息一度被封锁、被阻隔，然后导致了非常大的悲剧，但是 4 月 20 号，当卫生部长、北京市长下台之后，你看我们的报纸，包括党报，终于可以堂而皇之把“怕”、把“爱”放到他们的头版。这就是时代，这就是历史。真的，如果一个人他连怕的权力都没有，你怎么期望他去爱？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压抑他的恐惧、压抑他的怕，这个怕，只能变成一种恨。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的谈话只到这里。然后，我很愿意和大家继续讨论大家所关心的任何问题。

问：大自然的灾害和疾病给人带来很多灾难，有人可以胜出，是否真的解决一切，还是会有更严重的后果呢？

钱钢：唐山地震后，我们都佩带一个徽章，上有四个字：人定胜天。“人定胜天”，不是“人一定能胜天”的意思。可是在很多年里面，我们都说，我们能战胜这个“天”。我想在上世纪末的时候，我们人类对于自己的

能力充满了信心，尤其是当互联网出现了以后，甚至是非常的骄傲。但是 21 世纪初，我想人类变得冷静多了，有许多未知的东西，SARS 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们说 SARS 是被我们战胜的，言之过早啊！我想，人类永远不要去说我们要去战胜自然，我们只能说，我们跟它和谐相处，我们去理解它、去了解它。

问：你如何说服死难者的家人接受你的访问？写完《唐山大地震》之后会否对生命有另一种看法？

钱钢：这个朋友的问题，是站在今天来说的，为甚么呢？在今天 SARS 中间，我们如果去采访 SARS 死难者的家属，是很敏感，是需要特别慎重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采访死难者的家属，决不像今天这样的敏感，需要谨小慎微。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充满了斗争，充满了仇恨，真的，人比较粗糙，我们也可以说是坚强。事实上，当年许多唐山人谈到死亡的时候，是很平静的，而且由于死亡的人数太大了，几十万人，身边到处都是死亡者。所以这个问题在当年唐山，不是一个问题。在今天 SARS 的时候，一定是

一个问题。

从表面上看来，我自己对于生命，可能有了更多的尊重，但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我本来就有的，我想我去送孤儿的时候，我对小孩子，对他们的那种情感是本来就有的。我想一个健康的社会，它是使人们这种与生俱来的这种善良，能够健康地生长和发育，而不被压抑，不是被变成另外一种东西。

问：究竟是对社会灾害影响大，抑或是天灾对人的影响更为深远？

钱钢：我们讲天灾，离不开讲人，有很多时候，灾害的后果之所以如此严重，就是因为有人的失误。还有一部分灾害，本来不是甚么严重的灾害，但是某些人为了某些利益集团、某些政客的需要，他会利用这种灾害的信息，会有的，所以这样的，有的时候是人祸和灾害、天灾和人祸互为因果。

问：您刚才说的“人”的观念开始出现在中国内地的文学，这代表日后的中国的新闻报道都会如此报道吗？这是否中国新闻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钱钢：在 SARS 中间中国内地新闻的变化，谈不上“里程碑”。毫无疑问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正在日益地深入人心。如果说在 80 年代，我们仅仅认识到人的重要性，那么在今天就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概念上的“人”的重要性的问题了。因为大家要考虑在这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在政府的功能、在社会的功能，这个社会的体系，这个社会的各种公共事物，比如说教育，比如说新闻，比如说卫生事业，它如何健康地发展，才能确保人的权利。不仅仅是一种呼喊，所以说来日方长。中国新闻报道刚刚开始。刚才说的 4 月 23 日，这位学生的担惊受怕，可以放在《中国青年报》这份党报的头版，这只是刚刚开始，为甚么 2 月份不可以呀？我们就问这个问题。对不对？因为很多人还在说假话嘛！对吧，张文康还说：大家来北京旅游，没有危险嘛！欢迎你们来嘛！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用一个健康的制度来保障个人的权利，是这个问题。

问：请问自从发生唐山大地震后，你对中国政府在处理天灾方面有何评价，有甚么地方需要做出改善？

钱钢：毫无疑问，从唐山地震到现在的二十七年间，人们对于灾害的处理能力，我们叫危机处理能力，叫风险的管理，这种能力是开始增强了。但是，我们今天的防灾救灾体系，还有许多的工作需要做。这次公共卫生的漏洞大大地暴露出来了。SARS 以后，CCTV 专门去做了北京第一人民医院的内部的调查，才发现，这是最好最好的医院吗？还有那么多的漏洞需要解决。另外，我还要补充一点，SARS、地震和别的灾害有一个不同，就是它的未知性。台风、洪水都有很多的明确的预兆，你都有很多很成熟的对付它的办法；SARS 没有，没有疫苗；地震，地震最可怕的是，甚么时候要发生地震，全人类，不要说中国，不要说西方世界，也都不知道的，特别大的一个谜，人类对于地底下发生的很多变化，特别茫然。所以说，真的不能说大话，可能很多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问：唐山大地震有大自然的警告，但人却没有察觉；而 SARS 在香港爆发前也是有的，但人呢，依然没有发觉。这两种情况有甚么不同？

钱钢：据我掌握的有限的信息，好像 SARS 出现之前是没有预兆的，因为我们现在很难讲在 SARS 之前，中国内地和香港出现的较大规模的流感是 SARS 的预兆，这没有根据。但我可以肯定这个预兆是一定有的，因为人们倒过来去追溯它的时候，他想起来佛山的那个姓庞的是第一个病例，后来是深圳姓黄的厨师。SARS 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科学考题，它留下了非常大的一个考卷。SARS 来得非常奇怪，走得也非常奇怪。地震的前兆，大家看《唐山大地震》的书里面，那么多的前兆：鸡飞狗跳、猪跳出圈，可是，你能拿这个前兆来应用于下一次地震吗？比如说，你今天看见一只狗，突然地狂叫起来，你就能向全中国发布：地震来了！这样预告？这不可能！为甚么呢？它没有唯一性，我们说它没有排它性，它不是唯一的信号。1996 年的一天晚上，当年准确地预报过唐山地震的科学家，跑到我家，敲门说：不得了了！北京要地震了，要地震了！他说，你看，北京孔庙里的井啊，水没有了！还有甚么地方的鸟啊，又跟唐山地震时一样哗哗飞过去！又有蜻蜓跟蜜蜂怎么怎么飞。我真的相信

要地震了，然后我把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请到家里来，然后开始采访，说现在是 7 点 36 分，我们的地震工作者，在这谈一谈他的判断。这天晚上，很多人都跑到外面院子里去，那天天气真的是特别怪，特别的闷热，那天晚上，我在院子里走到夜里二三点钟，地震没来！所以说，人类认识自然真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非常长的一条道路。

问：你写作《唐山大地震》时，你在主观感情和客观事实上，如何做一个平衡？怎样才能确保报告没有渗入过多的个人感情或者是思想？

钱钢：《唐山大地震》的确渗入了很多个人感情或者思想，为甚么呢，你要知道中国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新闻启蒙还没有开始，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感情不受压制地宣泄出来，就已经是很难得了。在 1986 年写这样一本书，和当时中国内地读者们的欣赏习惯是一致的，他们并不会觉得我的主观过多。一篇作品，首先要有真感情、真思想，因为我们见过太多的假感情、假思想。先从假感情、假思想到真感情、真思想，然后才说更客观、更冷

静。

问：由发生唐山大地震与 SARS 相比，你认为当权者做法有甚么相同和不同？

钱钢：唐山地震的时候，中国处在政治的地震期。政治也在地震，为甚么呢？其实，毛泽东已经不能够去管理这个国家，他已经病重了，就在唐山地震期间，他逝世了。但是呢？他形成的一整套的方法，是固定的。这个方法是建国以来形成的。唐山地震不能预报，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它最让人感到扼腕叹息的就是，1974 年地震工作者就已经指出了，在北京、唐山、张家口、渤海湾这个圈里要发生大地震。1974 年，而且形成了国务院文件，说这个地区要严密地防范大地震。这多可惜，就是说 74 年的时候就已经圈了这个地区，这个期间发生了几次大的地震，最大的是辽宁海城的一个七级多的大地震。好了，这个大地震发生了以后，大家反而茫然了。等到北京又出现了很多迹象，北京周围、唐山出现很多迹象的时候，科学工作者不能够很大胆地做决断，有一个原因就是离北京太近了，如果要预报，就意味着毛主

席要搬家。可以理解吗？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政治的压力，使科学的预报变得非常的胆战心惊。刚才我讲过 1988 年的“甲肝”，其实有很多思路是一样的，就是说社会要稳定，如果能不报就不要报，能少报就少报，但是关起门来要好好解决，你不能说关起门来不好好解决。医院政府都下了很大的力气，但是它基本的思路不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要讲信息公开、透明、流动。不仅是政府要发挥强有力的作用，社会，包括知识界，包括媒体，也要很主动地起来承担责任。

问：你认为青少年应该怎样看待中国文化？应该以甚么样的态度，面对中国文化？

钱钢：可能这位朋友在听到我讲《阳关三叠》的时候，勾起了这个问题。真的，我发自内心地讲，香港有许多西方色彩，是中国内地所看不到的，香港有很多中国色彩，也是内地看不到的。我希望香港永远地保持那种中西合璧的色彩，不要把它丢掉。为甚么我听到《阳关三叠》的时候，我会有那种感觉？这是这个民族沉淀了几千年的情感。我们给一个人送行的时候，用这种“西

出阳关无故人”的感伤方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方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根深蒂固的东西，不要把它丢掉。

好，时间关系，很抱歉，有很多朋友的问题，我们来不及回答。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20 世纪著名大地震简介

20 世纪中国的十个大地震

1920 年海原地震

1920 年 12 月 16 日 20 时 5 分 53 秒，中国宁夏海原县（北纬 36.5 度，东经 105.7 度）发生震级为八点五级的强烈地震。这次地震，震中烈度十二度，震源深度十七公里，死亡二十四万人，毁城四座，数十座县城遭受破坏。它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波及范围最广的地震，宁夏、青海、甘肃、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四川、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福建等十七地有感，有感面积达二百五十一万平方公里。海原地震还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地震滑坡。地震发生时山崩土走，有住室随山移出二三里。灾区有的一间窑洞压死一百多人；有的村庄三百多口人在山崩时同葬一穴。死者陈尸百里，伤者遍地哀嚎，野狗群出吃人，灾民情景惨不忍睹。

1927 年古浪地震

1927 年 5 月 23 日 6 时 32 分 47 秒，中国甘肃古浪（北纬 37.6 度，东经 102.6 度）发生震级为八级的强烈地震。这次地震，震中烈度十一度，震源深度十二公里，死亡四万余人。地震发生时，土地开裂，冒出发绿的黑水，硫磺毒气横溢，熏死饥民无数。古浪县城夷为平地。甘肃某天主教堂，一修女怀抱四名孤儿埋于屋瓦中，蒲登波罗克大主教称之“世界末日将要来临”！

1932 年昌马地震

1932 年 12 月 25 日 10 时 4 分 27 秒，中国甘肃昌马堡（北纬 39.7 度，东经 97.0 度）发生震级为七点六级的大地震。此次地震，震中烈度十度，死亡七万人。地震发生时，有黄风白光在黄土墙头“扑来扑去”；山岩乱蹦冒出灰尘，中国著名古迹嘉峪关城楼被震塌一角；疏勒河南岸雪峰崩塌；千佛洞落石滚滚……余震频频，持续竟达半年。这次“稀有大震”，令各国科学家众说纷纭；

昌马，这个地图上都找不见的地名，成为地震学者关注的中心。

1933 年迭溪地震

1933 年 8 月 25 日 15 时 50 分 30 秒，中国四川茂县迭溪镇（北纬 32.0 度，东经 103.7 度）发生震级为七点五级的大地震。此次地震，震中烈度十度，迭溪镇被摧毁。震前该地异象迭出：犬哭羊嘶，蛇出鼠惊，乌鸦惨啼，母鸡司晨。地震发生时，地吐黄雾，城郭无存，有一个牧童竟然飞越了两重山岭。巨大山崩使岷江断流，壅坝成湖。1933 年 10 月 9 日 19 时，地震湖崩溃，洪水倾湖溃出，霹雳震山，尘雾障天，造成下游严重水灾，仅灌县境内捞获的尸体就有四千多具。迭溪地震和地震引发的水灾，共使二万多人死亡。

1950 年察隅地震

1950 年 8 月 15 日 22 时 9 分 34 秒，中国西藏察隅县（北纬 28.5 度，东经 96.0 度）发生震级为八点五级

的强烈地震。此次地震，震中烈度十二度，死亡近四千人。强震使世界各国的地震记录仪纷纷出格，美国的科学家认为地震发生在日本，而日本的科学家认为地震发生在美国。喜马拉雅山几十万平方公里大地瞬间面目全非：雅鲁藏布江在山崩中被截成四段；整座村庄被抛到江对岸。几百名喇嘛和尼姑深埋寺院的瓦砾之下。一位在印度境内的英国茶叶种植园主说地震“听起来就像高速火车通过隧道”。成千上万惊恐的印度人喊着“老天爷发话啦，老天爷发话啦”逃奔旷野。

1966年邢台地震

邢台地震由两个大地震组成：1966年3月8日5时29分14秒，河北省邢台专区隆尧县（北纬37度21分，东经114度55分）发生震级为六点八级的大地震，震中烈度九度强；1966年3月22日16时19分46秒，河北省邢台专区宁晋县（北纬37度32分，东经115度03分）发生震级为七点二级的大地震，震中烈度十度。两次地震共死亡八千零六十四人，伤三万八千人，经济损

失十亿元。这是一次久旱之后的大震。地震发生后，漫天飘雪。中国总理周恩来三赴震区，百姓的苦难使他落泪，他指示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地震预报系统。中国的地震预报事业在邢台地震的血泊中矗立起划时代的里程碑。

1970 年通海地震

1970 年 1 月 5 日 1 时 0 分 34 秒，中国云南省通海县（北纬 24.0 度，东经 102.7 度）发生震级为七点七级的大地震。此次地震，震中烈度为十度强，震源深度为十公里，死亡一万五千六百二十一人，伤残三万二千四百三十一人。为中国 1949 年以来继 1954 年长江大水后第二个死亡万人以上的重灾。震前，豕突犬吠，雀啼鱼惊，墙缝喷水，骡马伤人。当时全国地震工作会议正紧锣密鼓筹备，强震猝然而至。地震发生时，极震区内，村寨房屋尽毁，地面或裂或陷。中国总理周恩来于除夕之夜召见青年地震预报工作者，号召“地震预报问题你们要好好攻关”。

1975 年海城地震

1975 年 2 月 4 日 19 时 36 分 6 秒，中国辽宁省海城县（北纬 40 度 39 分，东经 122 度 48 分）发生震级为七点三级的大地震。此次地震，震中烈度九度强，死亡一千三百二十八人，重伤四千二百九十二人。经济损失八点一亿元。由于此次地震被成功预测预报预防，使更为巨大和惨重的损失得以避免，它因此被称为 20 世纪地球科学史和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迹。

1976 年唐山地震

1976 年 7 月 28 日 3 时 42 分 54 点 2 秒，中国河北省唐山市（震中纬度 39.4 度，东经 118.0 度）发生震级为七点八级的大地震。此次地震，震中烈度十一度，震源深度十一公里，死亡二十四万二千人，重伤十六万人，一座重工业城市毁于一旦，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亿元以上，为 20 世纪世界上人员伤亡最大的地震。这次地震的预报过程极为复杂。海城地震发生后，京、津、唐地区是否

还有大震的问题在地震界引起争论，一批地震工作者对这一地区的监视一直持续到唐山地震发生之前。中央政府最终没有得到来自国家地震局方面提供的短期临震预报意见，以至唐山市最终没有预防。然而，河北省青龙县在全县范围内采取了预防措施，取得了为世界瞩目的防震减灾效果。唐山地震是数十万蒙难者的巨大悲剧，也是地震工作者终生的创痛。

1988 年澜沧、耿马地震

1988 年 11 月 6 日 21 时 3 分、21 时 16 分，中国云南省澜沧（北纬 22.9 度，东经 100.1 度）、耿马（北纬 23 度 23 分，东经 99 度 36 分）发生震级为七点六级（澜沧）、七点二级（耿马）的两次大地震。相距一百二十公里的两次地震，时间仅相隔十三分钟，两座县城被夷为平地，伤四千一百零五人，死亡七百四十三人，经济损失二十五点一一亿元。由于本次地震和十二年前的唐山地震一样发生在中国的“龙年”，又由于 1988 年中国灾祸频仍，使一些中国人加剧了对“龙年”的恐惧。但科

学家们关心的是，这个地震是否标志着中国 20 世纪末一个新的地震高潮期的到来？

20 世纪国外的十个大地震

1906 年美国旧金山大地震

1906 年 4 月 18 日晨 5 时 13 分，一次八点三级地震猛烈袭击了旧金山及周围地区。地震的肇因是美国西海岸“圣安德烈斯断层”的活动。旧金山市无数的房屋被震倒，城市生命线——水管、煤气管道被毁。地震后不久发生的大火，整整燃烧了三天，烧毁了五百二十个街区的近三万栋楼房。旧金山市有七百余人死亡，经济损失当时估计为五亿美元，其中百分之七十由保险公司赔偿给投保人。这场地震使一些保险公司彻底破产。美国作家杰克·伦敦亲身经历了这次地震，写下著名的《旧金山毁灭了！》一文。

1908 年意大利墨西拿大地震

1908年12月28日晨5时25分，意大利著名的旅游胜地西西里岛的墨西拿市发生七点五级地震。地震时，城市房屋跳动旋转，地缝开合喷水，海峡峭壁坍塌入海。这个有千座石造金字塔的城市，在瞬间夷为平地。地震引起的海啸，洗劫了墨西拿海峡两岸的城市。这次地震中共有十一万人蒙难，其中墨西拿市有八万三千人死亡。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

1923年9月1日上午11时58分，日本横滨、东京一带发生七点九级地震。两座城市如同米箩作上下和水平的筛动，建筑物纷纷倒塌。时值正午，市民们家中尚未熄火的炉灶在刹那间被掀翻，无数木结构的房屋被引燃，一场无法控制的火灾在地震后发生。城市陷入火海，热气流引发狂风，一百二十条火龙卷、烟龙卷冲天而起，将房屋、汽车、尸体吸到半空中。与此同时，海啸扑向海岸地区，扫荡船只、房屋。这次灾害造成十四万三千人死亡，当时的经济损失为二十八亿美元，日本全国财富的百分之五化为灰烬。

1939 年土耳其埃尔津詹大地震

1939 年 12 月 27 日凌晨 2 时到 5 时，八级地震猛烈震撼土耳其，特别是埃尔津詹、锡瓦斯和萨姆松三省。埃尔津詹市除一座监狱外，所有的建筑物尽成废墟。地震造成五万人死亡，几十个城镇和八十多个村庄被彻底毁灭。地震后，暴风雪又袭击灾区，加剧了灾难。

1960 年智利大地震

1960 年 5 月 21 日下午 3 时，智利发生八点三级地震。从这一天到 5 月 30 日，该国连续遭受数次地震袭击，地震期间，六座死火山重新喷发，三座新火山出现。5 月 21 日的八点五级大地震造成了 20 世纪最大的一次海啸，平均高达十米、最高二十五米的巨浪猛烈冲击智利沿岸，摧毁港口、码头、船舶、公路、仓库、住房。时速七百零七公里的海啸波横贯太平洋，地震发生后十四小时到达夏威夷时，波高仍达九米；二十二小时后到达一万七千公里外的日本列岛，波高八点一米，把日本的

大渔轮都掀到了城镇大街上。这次地震，智利有一万人死亡或失踪，一百多万人口的家园被摧毁，全国百分之二十的工业企业遭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五点五亿美元。在地震中，智利发生了令人发指的用活人祭神事件——一名六岁的男孩被人杀害后取出心脏。罪犯被捕后，声称他们是在“祈求大地和海洋的安宁”。

1970 年秘鲁钦博特大地震

1970 年 5 月 31 日，秘鲁最大的渔港钦博特市发生七点六级地震。在地震中有六万多人死亡，十多人受伤，一百万人无家可归。钦博特遭受地震和海啸的双重袭击，损失惨重。该市以东的容加依市，被地震引发的冰川泥石流埋没，全城二万三千人被活埋。

1985 年墨西哥大地震

1985 年 9 月 19 日晨 7 时 19 分，墨西哥西南太平洋海底发生八点一级地震，远离震中四百公里的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遭到严重破坏，七百多幢楼房倒塌，八千多

幢楼房受损，二百多所学校夷为平地，繁华的华雷斯大街多处变为废墟。墨西哥城百分之四十的地区断电，百分之六十的地区停水达两周，与国内外的电信全部中断。这次地震，共有三万五千人死亡，四万人受伤，三万二千人无家可归。远离震中却遭受如此惨重损失的原因，是因为该市主要部分建筑在一个涸湖上，地基松软，再加上过量采用地下水，使地层逐年沉陷，建筑物更加不稳。

1988 年亚美尼亚大地震

1988 年 12 月 7 日上午 11 时 41 分，当时的苏联亚美尼亚共和国发生六点九级地震，震中在亚美尼亚第二大城市列宁纳坎附近，烈度为十度，该市百分之八十的建筑物被摧毁。地震造成二万四千人死亡，一万九千人伤残，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亿卢布，超过切尔诺贝尔核电站事故的损失。这次地震的特点是震级不高，但损失惨重。1989 年，一个同样震级的地震发生在美国旧金山，仅死亡六十八人。

1990 年伊朗西北部大地震

1990 年 6 月 21 日 0 时 30 分，伊朗西北部的里海沿岸地区发生七点三级地震，震中在首都德黑兰西北二百公里的吉兰省罗乌德巴尔镇，该镇在地震中完全毁灭。地震使五万人丧生，六万人受伤，五十万人流离失所，九万幢房屋和四千栋商业大楼夷为平地，全部经济损失为八十亿美元。

1995 年日本阪神大地震

1995 年 1 月 17 日晨 5 时 46 分，日本神户市发生七点二级直下型地震，大阪市也受到严重影响。这次地震造成五千四百多人丧生，三万四千多人受伤，十九万多幢房屋倒塌和损坏，直接经济损失达一千亿美元。神户市两座人工岛沙土液化严重，几乎所有岸壁崩塌，滑向大海，连接神户市和人工岛的跨海大桥也损坏严重，使日本第二大港神户港顿失生机。由于电线短路和煤气泄漏，灾区震后发生五百多处火灾，在火灾最严重的地方，

烈火蔓延了一千多米。